



黨論

著奇少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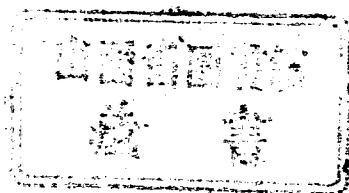
行印店書華新岳太

1947.4.

黨

論

劉少奇著



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076504

目 錄

- 人的階級性……………(一)
-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六)
- 論黨內鬥爭……………(一八)
-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五七)
- 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八三)
- 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九一)
- 答宋亮同志……………(一〇一)
- 附：宋亮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一〇五)

人的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一種本性，一種本質。

人有兩種本質：一種是人的自然本質，即人的體質、聰明、健康及本能等（比如在醫學上就指各種體質的人）；另一種是人的社會本質，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及其要求等。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的人們是作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會本質，就由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由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會本質也各有不同。過去孟子、告子、荀子等爲了「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爭論個不清楚，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掩蔽人們這種社會本質（本性）的階級差異。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各有不同。剝削者認爲善的，被剝削者認爲惡的，被剝削者認爲惡的，剝削者認爲善的，離開階級關係而來討論人們的性善性惡，自然鬧不清楚。猶如我們如果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就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好壞如何，更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黨性如何。

人的階級性，就是階級社會中人的社會本性，社會本質。

人的這種階級性，是那裏來的呢？

人的階級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一定集團的人們，長期地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佔有一定的社會生產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產着、生活着與鬥爭着，即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模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

性、寒微性、組織上的集中性、機械性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性質。

艾比如說農民肥田由於農民長期附着土壤上進行較慢的、穩定的、隨風而動的、自由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這種經濟的獨立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們對於權利勞動的負擔等，就產成了農民經濟的獨立性、機械性、寒微性、組織上的集中性、機械性、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寒微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性質。

由於無產階級是集中在大產業中生產，分工很細，生產動作都受機械的限制與彼此牽制，他們是一無所有的工錢勞動者，依靠工資過活，他們與一切勞動者沒有基本的利害衝突，因此，就產成了他們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於財產的沒有興趣，及對於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鬥性、忍耐力等等。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性質。

一切剝削階級，都要欺騙與壓迫被剝削者，都要互相爭奪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剝削者的欺騙性、對人的壓迫性及互相爭奪性。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由於剝削階級互相爭奪與分割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與剩餘價值而發生的。

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數人的幸福，把全人類或大多數人等等剩餘剩棄，追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舊套」，「偉大」與「敵人受痛苦」的基礎，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與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解放自己，來造成少數人的剩餘權利，這纔是資產階級的高貴，有大與被人受痛苦相基礎，資產主義的道德的基礎。

這就是階級社會中人們各種不同的階級特性。這種階級特性是相入剝削階級在產中剝削與被剝

位及特殊生產方式生活方面慢慢養成起來，成爲人們的一種天性。然而這種天性，是社會的，並不屬於自然性，不是人一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

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

共產黨要把無產階級各種偉大的進步的特性發展到最高度。每個黨員要照這一切特性來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備這一切優良的特性。這就是本質的改造。一切非大產業中出身的黨員，他們也具有非無產階級的天性，他們的改造工作是需得更多的。

無產階級的特性，也並不是不變的。在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同時也形成和發展它的特性。最後發展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的改造時期，由社會主義過到共產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不斷改造社會，不斷改造人類的本質，同時也不斷改造自己的本質，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的階級區別消滅了，人們的階級特性也要消滅。這就是人類本質改造的全部過程。

但是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階級性。這也過由於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地位，使得共產黨員能够公開宣佈這個真理。這個真理的公佈，對於無產階級並沒有害處，而對於其他一切的階級則是種嚴重的打擊，揭破他們的「黑幕」，使他們更難於掩護他們所專人的利益。共產黨一切黨派與階級，都不承認他們的自己的黨性與階級性，都要把自己描寫成爲似乎是「超黨派」、「超階級」代表「全民」的樣子。其實在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後面，就隱藏着剝削階級向被剝削的實際利益，他們在剝削者面前

，不敢承認自己的黨派性與階級性。而小資產階級承認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是由於他們的幻想與無知。長於幻想，畏懼嚴重的實踐與鬥爭，即是表示小資產階級的本質。

作一個好的黨員，建立一個好的黨

本年七月一日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抗敵報、前鋒報及邁進報均要我寫兩文。我想，我們的黨已成立十九年了，在這十九年中，它經過了「二七」運動，經過了第一次國共合作與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是說，在這十九年中所有中國歷史上一切偉大的事變與羣衆的革命運動，我們的黨都是站在羣衆鬥爭的最前綫，每一事都表現着我們的黨和無數的黨員是具備着無產階級政黨之革命的英勇氣概、犧牲精神和堅忍貞絕的模範，表現着我們黨在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的偉大作用，表現着我們黨是有能力繼承並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事業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同時也表現着我們的黨是最堅決最徹底最敢爲中國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而奮鬥，最能與壓迫中國民族的帝國主義戰鬥的黨。

我們最大多數的黨員，他們那種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鬥的精神，那種爲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而艱苦工作的精神，那種既不想升官發財，又不爲名爲利，而一心爲了勞苦大衆與人類解放事業而不疲倦的埋頭苦幹精神，表現了他們有人類中最崇高的道德，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因此也就吸引了並且吸引着無數千百萬的誠實的人們對於我們的黨，對於我們那些最好的黨員的敬仰。不論我們的敵人是如何造謠誣蔑我們的黨，如何說我們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不近人情的人，如何用一切殘暴手段對待我們及對待接近我們的人，然而無數千百萬的人們還是把

他們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身上，他們在無形中對我們的黨下了這樣一道殘忍命令：你們共產黨人，是真正能犧牲自己為中國民族與勞苦大眾的解放而戰鬥的人們，中國之所以能得救，中國之所以能走上富強、獨立與自由的光明前途，就賴有你們這樣一批人的努力，因此，給着你們以救中國，創造獨立、自由與幸福的新中國之任務。這就是說，我們的黨在十九年來賴有無窮先烈的英勇犧牲與無數黨員最好的努力，已經使我們黨大大的發展了，它已成為全中國的領導的黨，它已與中國廣大的羣衆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它已在廣大的羣衆中有了極高的威信，而且他在十九年來經歷了比世界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不論公開的與秘密的，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經濟的與政治的，思想的與政策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鬥爭，我們的黨都經驗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我們有許多黨員十餘年來，一直就沒有放下過武器。這是十九年來為世界任何一國革命政黨所不及的。所以我們中國的共產黨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即已確立共產國際中最好的支部之一。這是我們偉大的黨在偉大的十九年中在偉大的中國所已獲得的成績。這些成績，不獨是對中國一個國家有它極重大的意義，對於世界，特別對於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亦有其重大的國際意義。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中的偉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已站在世界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領袖的地位。這是共產國際在很早以前對我們黨的評語。

然而，這些成績，並不是那樣容易得來的，而是經過了整整十九年的苦戰與艱苦工作，犧牲了數十萬最好的共產黨員與非黨革命者的頭顱和鮮血，克服了黨內各種錯誤和機會主義的思想，淘汰了黨內各種腐爛的渣滓，並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我們許多黨員的頭腦，才能鍛鍊出如我們今天這樣的黨，才能獲得這樣偉大的成績，這是為無數革命者的熱血所澆灌而長成起來的。中華民族與勞動人類的鮮豔之花。不久，它將結成爲中華民族與勞動人們賴以得救賴以自由的無

價之思。從我們黨過去十九年的歷史證明：不論我們黨內一切敵人如何恫嚇、咒罵、譏諷、陰害、蹂躪、剝削我們，——如何採用一切人類之殘暴的刑罰來對待我們，他們終究是不獨不能消滅我們的黨，甚至連阻止我們黨的進展亦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黨，總是在和這些敵人的這些殘暴手段之鬥爭中，生長、壯大與堅強起來的。因為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塞維克黨，是與黨衆有密切聯系之黨，是代表着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階級的黨。因此，我們是永遠不會消滅的，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世界上已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戰勝我們的黨，相反，我們將戰勝世界上一切的反動勢力，將把世界改造成為最進步最美麗最合於我們理想的共產主義世界。

因此，在紀念我們偉大的黨之十九週年的今天，我們無雙的新老黨員，應該如何來檢查我們黨所已獲得的成績及我們黨在中國與世界的革命運動中所已取得的重要地位？應該如何來舉揚與篤信我們黨的光明前途？應該如何來保護我們黨，爲了黨內每一個利益（就是目了中華民族與人類解放的利益）而犧牲奮鬥，盡我們盡善的努力？黨的建設，達到今天我們中國黨這樣的程度，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們的新老黨員，接受了我們先烈遺留下來的這一份無價的遺產，應該如何的寶貴他！如何使我們黨已有的成績和陣地之基礎上推動我們的黨再向前進！建設它、加強它、發展它、以至於達到最高級最完善的程度，這就是我們今天一切新老黨員的責任，這也是我們一切的一切。我們要建設一個最好的黨！要達到這個目的，固然須要我們各方面的努力，須要中央與各級領導機關正確的領導，但是最基本的還須要我們有很多很好的黨員。因此，我們黨員在此黨的十九週年之偉大節日，應該如何誠心的來檢查一下自己，應該問問自己，你爲了黨的利益、黨的發展與勝利，曾經盡了你何種努力？並且你預備怎樣在今後來盡你的努力？你是否曾經有過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以及怎樣才能在今後不會再有違反黨的利益之思想、言論與行動？我想，黨員問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使自己進步的出發點。

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在黨內作一個好黨員，而不應該做一個不好的黨員。我們怎樣才能作一個好的黨員？這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來作我們的模範，這在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這篇文章裏已說了許多，這裏不來詳說他。但我最近在黨內某些同志中發現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與行動，有了這些思想和行動，就決不能使我們成爲一個好的黨員，並且還要影響其他的黨員及阻礙我們黨的進步。今特利用黨的十九週年紀念之便，略論之如下：

第一、要盡心負責的爲黨工作，愛護黨的每一種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樣焉

我們共產黨人，是今天世界上二種特殊的人物，我們是爲了公共事業，即共產主義與人類謀康樂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爲了大眾的利益與解放，爲了我們大家的長遠的幸福，我們有時不能不暫時有所犧牲，不能不犧牲自己。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當着爲了整個黨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候）爲了大眾解放的公共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這是我們黨員大家所知道的，也是我們大多數黨員所能身體力行的，然而看我們的某些黨員中，在一些最平當的事物上，常常暴露出他們並不能這樣作。

這些同志常常用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來對待屬於他自己個人的事物和屬於黨的公共事物。就是說，當某種事物如果是個人的，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自己的，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愛惜的、節省的、盡心的、負責的，但是當某種事物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黨的公家的，不是他自己的，如是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不愛惜的、不節省的、不盡心的、不負責的，或者甚至把黨的事物暗中竊取作爲私有。就是說，他對自己的私人事物的態度，是與公共事物的態度不同的，他對黨的公共的事物，認爲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愛惜、浪費、不盡心、不負責的去照顧。爲什麼？因爲這不是他自己的，因爲這是公共的。他不把公共事

物當作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盡心負責的去照顧與努力。這類現象，在我們某些黨員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某件東西如果是他自己的，他是愛惜的，某種事情，如果是爲他自己作的，他是盡心的、努力的、負責的，但是如果某件東西是公家的，他就以不愛惜、某種事情，如果是爲黨爲公家作的，他就可以不盡心、不努力、不負責。這種情形，常常成爲我們中浪費現象及各種不負責任現象的產生之根源。

這種觀念，很顯明，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是一種舊社會的私有觀念的殘餘，他不了解黨員自己的事物與黨的公共的事物之間的矛盾一致的關係，他認爲黨的公共的事物，不是他自己的事物，所以對黨的公共的事物之態度，不同於對自己的事物之態度。很明白，這對於一個黨員來說，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我們的黨員必須改正。

我們應該說：只有屬於黨的屬於勞動者全體所有的公共的事物，才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否則，對於我們黨員來說，對於勞動者來說，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當着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中工作，工人自己覺得這是爲他自己，爲他自己的家庭的生活而工作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工人都不爲他們自己工作，而是爲資本家的利潤而工作。只有當着工廠已因革命的勝利而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所有，成爲社會的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公共財產的時候，列寧才說，只有在這時候，工人才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爲他們自己工作，爲他們自己生產。

當着農民們在地主的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農民們自己覺得這是爲他們自己，爲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勞動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農民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而是爲了地主的地租，爲了高利貸者的利息，爲了政府的稅收而勞動。只有當着土地已經收歸國有，當着國家已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着地主富農及私人商業已經消滅，當着農民已成爲國家農場與集體農莊那公

共產黨上的勞動者時，只有在這時候，農民們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

列寧說：蘇聯是工人自己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是工人階級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個人所私有的。當着俄國的工人們在十月革命後，爲自己的國家在公共的工廠中自動努力工作，提高生產，節省材料，而表現出工人們爲公共事業而努力生產的勞動熱忱時，列寧曾經對着這種情形說，這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因爲工人們已經不是爲資本公司，而是爲他們自己而勞動了。他們用了新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新的勞動。

由此看來，自己的事物，常常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黨、公共的、爲工人階級與勞動者全體所共有的事物，就恰恰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公共的與自己的，在這裏表現其一致性。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及一切覺悟的勞動者，應該把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當作自己的事物，應把公家的事務當作自己的東西一樣來愛惜它，把黨的公共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一樣盡心努力負責的去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鬥的高尚的精神，才成爲可靠的黨的工作者與負責者，才成爲一個好的黨員。

從這裏看來，某些同志的本位主義，也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這種本位主義不了解他自己負責的一部份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之矛盾一致的關係。他只認爲他那部份工作是他自己的，而不認爲別人負責的工作及黨的整個工作都是我們自己的。他對自己負責的工作與對別人負責的工作根本上用了不同的態度，所以也形成他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的錯誤。這種本位主義的發展，對黨的工作是很有害的，他爲了部份的個別利益而犧牲妨害整個的全體的利益，他違背着部份的利益要服從全體的利益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要不得。好的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本位主義的。

固然，沒有部份，也就沒有全體，部份的利益，常常與全體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主

張完全不要部份，而只主張部份服從全體，即是當部份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該犧牲部份的利益，而不應該犧牲全體。所以我們有時爲了更大、更長遠的全體的利益，而主張犧牲某一部份，還是應該的。

第二、爲黨的與勞苦大眾的公共事業而犧牲，是最值得。

在某些同志中說到犧牲，就提出了所謂值得與不值得的問題，要怎樣犧牲對於一極共產黨員才是值得？又怎樣才是不值得呢？在這個問題上某些同志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不同的非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而來的，他們具有舊社會的甚至剝削者的享樂的人生觀（如所謂「人生行樂耳」、「浮生若夢爲歡何如」等），認爲他們沒有享到快樂的生活就犧牲，是不值得的。認爲一生沒有大吃大喝過，沒有過過舒適的奢侈的生活，沒有嫖過女人，沒有出過風頭，沒有威風凜凜過一下……而犧牲了，對於人生是不值得的，如果這些事都作過了或各門都經過許多，那末對於人生就是值得的。他們說得幹過這些事，那末死了都值得。這是中國目前社會上相當普遍的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多少反映到我們一些落後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是在我們某些黨員中就發生享樂的觀念，對目前艱苦生活艱苦工作發生厭倦的心理，如是他們就想「要去貪污、腐化、動搖以至墮落而脫離黨與革命。他們想了：作一個地主、資本家、富人、剝削者，是很舒適、很值得的，他們沒有去經驗過，他們想要去經驗一下，如是他們就從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跑到剝削者的隊伍中去。剝削者的任務機關也就利用我們某些落後份子的這個弱點，從而加以威逼利誘，如居某些人就這樣的墮落與反革命了。但是在富人剝削者那裏，那種腐敗、墮落、黑暗的生活與家庭，他們暗淡的前途，他們的生活也並不是舒適的，他們的苦悶、無出路、無生氣，也是十分嚴重，比我們前進的革命黨人是更爲苦悶的，因爲他們更接近於死亡的階級，他們已爲自己掘下了墳墓，他們明知是很悲慘的不願意的，然而他們又無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鑽進去並活

害自己。世界上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此！然而，偏還有人說：他們是「最值得的」。這不奇怪嗎？剝削者不勞而食，倚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養得像肥豬一樣，一點事不作，對世界人類社會一點好處也沒有，還要在世界上作威作福，危害無數千百萬勞動的人們，這是世界上最可鄙最可惡的事情，從來一切正義的歷史家，就鄙薄那些不勞而食的剝削者，就尊敬那些勞動的偉人們，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剝削者中有明白自己的前途與歷史進化的人，尤其是剝削者的青年子弟，他們不滿意自己家庭那種腐敗黑暗封建的生活，他們學了自己的將來，而丟棄了自己的家庭，跑到勞動者隊伍中，同擠或加入前進的革命政黨，已有不少了。他們厭倦那種剝削者的豬一樣的生活，他們無所留戀的丟棄了這種生活，他們很對！然而，在我們前進的革命政黨中之某些落後份子，還有人想要去嘗一嘗這種生活的滋味，還以為這或許是很值得的。這對我們黨員來說，難道不奇怪嗎？很明白，這是一種倒退落伍的思想。這與共產黨員的黨籍是完全不能同時並存的。

那末，作一個人，特別作一個共產黨員，要怎樣才算值得呢？

我們說，一個人，特別一個黨員，爲了黨，爲了社會進化與人類解放，爲了無數千百萬勞動人類的共同長遠的利益。而犧牲奮鬥到底，以至終身，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們的敬仰，最爲萬世子孫所懷念所歌頌的。這在我們黨內已有無數的先烈，他們就是最值得，最爲大眾所景仰的人。如果是爲了剝削者的利益，爲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優裕生活，爲了反對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的解放，而犧牲奮鬥或老死爛米田間與高樓大廈，那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那是永遠要被大眾唾棄和唾罵的。衆衆的剝削者及爲剝削者少數人的福利奮鬥的人，都引起人們的咒罵。我想，一個有爲的有出息的人，特別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完全應該瞭解這一點的。

所以在我們中，那些埋頭苦幹的黨員，那些艱苦工作，不怕困難，不怕危險的黨員，那些一心一意爲了黨與人類解放而奮鬥的黨員，那些苦著苦著，幸福在後的黨員，是我們的好黨員。

雖然在這些人要求上，他們暫時吃一頓虧，然而積少成多，或者最後是：爲我們大家及黨負責任。所擔負的，也總是誰。他們知道價值，他們知道空手頭苦幹，弄出風頭，怕困難，怕危險，不安心爲黨爲大類的利益奮鬥的人。那些要求空手頭苦幹，吃苦在後的人，都不是好黨員。雖然他們在某些個人享受上或某種臨時上一些權利，然而他們是黨黨最後是：爲我們大家及黨負責任所反對的。也就是說，他們最後可能弄一頓不值錢。

還有在最近有個別的黨員要求到政廳機關去作行政工作。原因就是因爲政府機關有幾塊錢薪水一月，他們想要幾塊錢一月，他們就調度，就要求調工作，要求行政機關去。同志們！這是什麼觀點？有人或者反對行政人員的薪水，如果地向政府提議取消或改正行政人員的薪水制度，那是對的，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態度。然而某些人的反對，不是真正反對行政人員有薪水，他不反對，而是希望他自己也能得這點薪水。他口頭上的反對，只是藉口而已。同志們！這也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我們加入黨，艱苦工作，不是爲了幾塊錢，不是爲了別的，而是爲了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所以我們自願不要錢，燻燻幾百元一月的薪水也不去作，而要來作這種無薪水的革命工作，比幾百元薪水一月更值得的革命工作。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黨員完全明白的問題，那些不明白的人，應立即改正。

此外，在參加黨員中還常常有如下現象：即在分配黨員工作的時候，他們要求到最安全，最有保障，工作最容易最簡單，而且是穩當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去，而比較不安，有危險，地方瘠貧，生活艱苦，工作困難，環境複雜的地方與工作，就大家誰也不願意去，即使這種工作對黨對革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他們爲了痛快與好的生活就不願意去作。如果硬要他去，他會向你說：你強迫我去的，我強迫我不滿意。同志們！這不只好黨員所應有的。好的黨員是不注重這些的。只問條件工作對黨對革命是重要，是否他能工作。如果對黨重要的他能够做的，他不

計較困難與否，環境複雜與否，即也去作的；他願意担負最艱苦困難危險的工作，他不要把困難的負擔推給別人去作，自己作最容易最便宜的舉措。這也是我們的黨員所應注意的。

第三、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

作一個共產黨員是最光榮的，但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我們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共產黨員，是我們自己要作的，沒有任何人來強迫我們作黨員，但不只是我們要作一個黨員或是一個黨員，這還不夠，還要共產黨允許我作一個黨員，不消除我的黨籍，才是一個黨員。就是說還要其他的黨員，黨的機關承認我是一個黨員，我才能是一個黨員，否則，只有我自己的願意，還不能是黨員。

我們共產黨員相信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一切都是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東西。所以我們的政策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講究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有一件事是終身不變的。這一件就是我們要為黨的利益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亦即是人類最後解放的利益而奮鬥到底。就是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這對於我們是終身不變的，變不得的，變了，就叫動搖、變節或叛變。這是黨員最大的恥辱和不幸。有了這一點不變，然後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據情況的不同而千變萬化，不變是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即靜止是運動的標準和尺度。我們的一切戰略策略的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就是要看這種變動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適合於這種利益與變動，不適合於這種利益就不應變動。所以，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是測量黨的及黨員個人的一切戰略策略與工作方式之變動是否正確的標準和尺度。自然，這種不變，一般來說，只是相對的。僅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是絕對的。因為在幾百年前或幾百年後，世界還沒有無產階級共產階級已不存在時，人們自然不會有為無產階級戰鬥利益而奮鬥的事。所以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來說，這也還是變動的。但對於我們黨員來說，這是絕對不能變的。只有

他們在主觀上終身絕對的忠實於黨與階級的戰鬥的利益，在客觀上，在我們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的實踐中總得是適合於黨與階級的戰鬥的利益，我們才是一個好黨員。

我們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我們對黨就不要有什麼秘密，不要把某些不利於黨的思想言論行動對黨隱瞞起來，或者明知某些思想、言論、行動對黨是不利的，而暗中秘密的去作。以為這黨是不會知道的。其實，我們的黨員如果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那末他的思想、言論、行動，他是一個什麼人？他有什麼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他作過什麼不適合黨的利益的事？一年二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直至他死，那裏會不被人知道的呢？最後總是會被人知道，被人了解的。結果，是隱瞞不了的。所以，我們黨員，不要有對黨隱瞞的不光明的事，過去作過的，自己講出來好了，我們黨是注意將來，不大追求同志的既往過錯的。講出不要緊，不講就不好，我們黨員應該有「生平所作、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坦白。

自然，我們也不是要黨員逢人便說出自己的歷史與過去的一切，不保守自己的秘密，也並不是要黨員不為黨保守秘密，而是要我們黨員不要秘密的去作那些違反黨的利益的事，不要口是心非，不要作兩面派。

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也就不怕有什麼事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因為誤會懷疑總是暫時的。真象總是在最後要暴露出來。一年二年被火誤會，被人懷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終身，你如果是一個好黨員，總是會被人明瞭的。暫時的誤會懷疑，對於個人常常不一定是有害的。因為誤會懷疑一旦被人明瞭之後，不獨能挽救你在誤會中的損失，而且增加對於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勵。

最後，我要說到，我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我們黨員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偉大的，黨的勝利，即是我們一切黨員的勝利。黨員只有在黨的勝利中才有自己的勝利。所以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好的黨，一定要使我們的黨繼續前進，這就一定要我們大多數黨員努力工作、努力學習、

努力提高與增進自己的品質，努力前進。才能建設一個好的黨。我們的黨已經很好，但還有缺點，還在某些環節中有錯誤，還有不中用的渣滓，還要繼續改進、繼續提高、繼續布爾塞維克化。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的民主共和國決定的因素。在中國沒有一個好的大的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中央的正確的領導與全體黨員的正確的努力，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要建設新的民主共和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作一個好的黨員！一定要建設一個好的黨！一定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建設一個新的中華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最後實現共產主義！

這就是我任黨的十九週年紀念日所要講的話。就以此來回答抗敵報、前鋒報、邁進報的徵文要求。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

論黨內鬥爭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講演！

一 引言

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黨內提出了加強黨員黨性鍛鍊的問題。聽說中央也通過了加強黨性鍛鍊的決定，不久我們就可以收到。爲了加強我們黨員的黨性鍛鍊，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鬥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來開展黨內思想鬥爭才算正確，又怎樣開展才算不正確呢？這便是我所要講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個領導廣大羣衆戰鬥的黨，黨爲了要實現自己所負担的歷史任務，便要和各種時期的革命的敵人鬥爭，便要和各種不同的革命的階層與階級聯合。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沒有一刻鐘不是處在嚴重的戰鬥環境中，黨與無產階級是經常地在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封建殘餘勢力的包圍之中。這些其他各種階級，現在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或在同無產階級的聯合中，經過黨與無產階級內部不穩妥的成份，侵入到黨中，無產階級鬥爭的心來，在思想意識上，在學習習慣上，在理論上在行動上，都常常影響到無產階級，這就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這就是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

黨的社會基礎，這也就黨內鬥爭的來源。

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

我們的黨從出世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黨外的敵人進行鬥爭，而且也同黨內的各種敵人的及非無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鬥爭。這兩種鬥爭是有區別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階級實質上是共同的。如果我們黨不進行這樣一種鬥爭，本經常在黨內進行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鬥爭，不經常在黨內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克服「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那末，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會在黨內發展，就必然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就要使黨不能鞏固發展，就要使黨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就必然使黨，使黨腐敗下去。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可能腐蝕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份，就可能使我們的黨或黨的某些部份起質的變化，變為非無產階級的組織，比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因為這樣而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所腐化，就是因為這樣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式的政黨，成為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支柱。所以這種黨內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也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圖避免黨內鬥爭的想法，那些不願批評別人錯誤以便換得別人也不批評自己錯誤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這種黨內鬥爭，主要的是思想鬥爭。它的內容，是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在黨內，由於同志間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抗，雖然可以發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種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的發展到黨內組織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一種思想鬥爭。所以沒有思想原則分歧的黨內鬥爭，同志間沒有原則分歧的相互傾軋，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無內容的鬥爭。這種無原則無內容的鬥爭，在黨內是完全不必要的，對黨是有害無益的，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切實避免的。

黨內鬥爭是保證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經常在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路線上進行

保持黨的無產階級的實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有了這個目的，黨內鬥爭必須在兩方面來進行，必須是在兩條路綫上來進行。因為敵人的思想，是從兩方面來影響黨的，是從右面或者從「左」面來進攻黨的，是在黨內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的；因此，我們的黨內鬥爭，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必須向這兩方面鬥爭，才能保持我黨的無產階級的一定的實質。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只進行單方面的鬥爭，如果我們疏忽對任何一方的警戒與鬥爭，那敵人就可以，而且一定從我們疏忽的一方面來進攻黨，那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不能鞏固黨，所以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路綫的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說：

「只有為擁護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為了確立這一個或那一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為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原則上的分歧，那麼，任何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綫，都是無濟於事的。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綫，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為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提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綫，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綫」，抹煞分歧的「路綫」，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綫」，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綫」。」「中間」路綫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且趨於腐化的政黨之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成為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又說：「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這就是黨內鬥爭的必要性。

關於黨內鬥爭的這種必然性，關於黨內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說得很多，同志們可以去查，我在這裏不多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問題，是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問題。現在大家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不想全盤的來說明這個問題，而只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就我個人所觀察到的，來提出我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還請同志們大家來討論！

二 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中的偏向

同志們！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無產階級做好了什麼工作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替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理論上準備好了鞏固的完整的體系。不僅如此，他們還替無產階級建立了獨立的組織，領導了無產階級的羣衆鬥爭。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在以後又組織了第二國際及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職工會，他們教育了並且指導了工人階級怎樣組織起來，怎樣進行鬥爭……

在第二國際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代），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是進行了廣大的組織工作，廣泛的開展了組織工人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是獲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當時是在資本主義第一和第二次重要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組織也是在這種和平時期建立起來的。黨與工會之間的區別還不很明顯，時期從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後，第二國際在考茨基領導之下，黨內沒有組織採取更進一步的劃和路線，以致機會主義腐化了第二國際各黨。這種黨與工會，一到帝國主義時代一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顯出它不能担负無產階級在新時期中所應該担负的革命的任務，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不夠不走到被產與沒落。

列寧的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快要死亡的時代。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時代要求無產階級建立堅強的戰鬥的政黨，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完全鞏固和統一的，並和無產階級羣衆有密切聯系的政黨，依靠這樣的黨，才能勝利的去進行極端嚴重的革命鬥爭。因此，列寧除在各方面恢復與發展了馬、恩的學說而外，還特別創立了一個完備的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學說。關於我們黨的建設的學說體系，基本上是列寧創立的。這個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策略完全不可分割的。

列寧創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時期的條件是怎樣呢？

在當時，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大戰的迫近，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擁有廣大組織的第二國際下的各國社會民主黨，還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還不願意，也不敢去準備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因此，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別分歧的，不能進行稍爲嚴重的戰鬥，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適合當時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要求。當時各國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理論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如勞資合作的理論，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可以經過議會鬥爭掌握政權，不必經過革命，因而不能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策略等等，而且在黨的組織問題上，也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及俄國的少數黨，主張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的水平，主張黨內不要秘密的組織與嚴格的紀律，主張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容許黨內的派別（具有不同思想和組織系統的派別）存在等，對於第二國際各國黨來說，黨的統一與紀律，黨內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這便是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些主要的具體表現。

在當時，還有俄國的經濟主義派，歐洲（如法國）的工團主義派等，他們主張工人階級，不要有政黨的組織，拒絕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或把工人階級的政黨附屬在職工會之下，主張「工會獨立」，否認黨對於工會的領導作用……。

在當時，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任務擺在面前，要求有一個堅強的戰鬥的黨去領導廣大羣衆，執行這種任務；另一方面，擁有數百萬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第二國際各國黨，又是那樣的不能，那樣的不能戰鬥，而且有組織上的各種機會主義思想支持着這種組織的落後與散漫。這便是列寧建設布爾塞維克黨的時期之具體的重要條件。

列寧在上述這種條件下，爲了建設一個能够勝任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與鞏固的政綱，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尤其不能不反對他們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初與孟塞維克的分歧，就是在組織問題上——入黨條件問題上的分歧。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建議的學說，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是在反對經濟主義派、工團主義派不要工人政黨理論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所以在列寧的黨的建設的學說上，就充滿了反對各種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充滿了反對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的理論；反對把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理論，反對黨內的無原則的和平，反對黨內的派別組織與派別活動等。列寧並在反對這些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確定了：黨是無產階級最覺悟、最勇敢、最進步的份子組織起來的，最先進的部隊，最有組織的部隊，最有紀律的部隊，而且是在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有職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團體以至政府、軍隊等等的組織，然而黨是無產階級這一切組織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領導其他一切的組織。因此，列寧就把黨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明確的區別開來了，列寧並且

確定了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有統一的嚴的紀律。這些黨的組織原則，是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這些就是列寧關於黨的建設學說之主要內容。

列寧主要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的，而主要不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的；這種情況，在十月革命以前，確是如此。當時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或者還沒有發展成爲系統的機會主義，所以在列寧關於黨的建設的學說中，充滿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即是充滿了反對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反對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反對不要黨內的思想鬥爭及害怕自我批評，反對黨內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反對工會獨立主義等。這是由於列寧建設黨的時期之具體條件中產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具體條件，那就和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時候的條件完全不同。

第一、中國黨的建設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是在俄國有維什維克已經取得勝利，有了活的榜樣以後，所以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照著列寧的原則去進行建設的。

第二、中國黨從開始到現在，在思想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影響。

第三、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容許工人階級和平的議會鬥爭，也沒有歐洲那樣的工人貴族階層。

第四、在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成份佔着相當大的比重，並有若干游民成份。這是中國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由於前面三個條件，就使我們中國黨建設，一開始在主觀上就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和道路進

行的。布爾塞維克黨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的多數黨員中都能背誦出來，而社會民主黨的那樣傳統與習慣，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因此，就使我們走了許多直路。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鬥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的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有的。認為不要自我批評，不要黨內鬥爭，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不要工人政黨及工會獨立等等主張，在黨內是不能公開發展的。唯則我們黨內的思想鬥爭，是還有不夠的地方，但那還是由於理論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則上的分歧，或者黨內個別負責人採用非常辦法壓制自我批評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黨內有什麼系統的反對黨內鬥爭的理論。

但是建立我們中國黨的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況，是發生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在主觀上嚴格的遵循着列寧的原則，這一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伴隨着，因此使我黨進步得很快，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的鬥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偏的偏向……。

許多同志是機械的錯誤的了解了列寧的原則，把列寧的原則絕對化。他們認為：黨在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黨內的民主；黨內鬥爭的必要，就否定了黨內和平；黨為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髙形式——在政治上領導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的羣眾組織，就否定了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對黨組織的組織之獨立性，統一的鐵的紀律，就消滅了黨員個人的個性及黨員的自動性創造性……許多同志是死記着列寧的原則，認為黨內鬥爭是必要的，自由主義、講和主義，是得不來的。但他們是機械的死板的運用這些原則，他們以為在黨內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

，不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應該而且必需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而且是鬥爭得越兇越好。黨內鬥爭的方式，黨內批評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間在黨內的對抗，愈尖銳就愈好，不然，就愈要犯自由主義、調和主義的錯誤。爲了要證明自己沒有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並證明自己是一個「十足的布爾塞維克」起見，他們就離開時間空間的具體條件，在黨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如是這些人也就成爲黨內鬥爭中沒有立場的「打手」，無原則的「鬥爭家」；嗜好鬥爭的「鬥爭家」，爲競爭而鬥爭，這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的醜事，這當然不能證明他們是「十足的布爾塞維克」，而只能證明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侮辱，並把布爾塞維克的名詞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

許多同志不了解：黨內鬥爭是原則的鬥爭，是爲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他們不懂得：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他們不懂得與不了解：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確立鬥爭目標的問題上，在選擇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問題上，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而在日常政務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只要這些問題不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就不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實行不調和的鬥爭，而應該作一切的妥協。這些正是列寧、斯大林的黨所固有例作風，但是沒有被我們許多同志學到。他們在這些應作一切妥協的問題上，也實行不妥協的鬥爭，如是他們就沒有不對抗的問題，沒有不對抗的時候，沒有不對抗的人。「一切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他們都要實行對抗，強使其絕對的相同。他們是一切都不妥協，絕對不妥協。他們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對抗，對抗就是一切。這就是他們的絕對主義。」

許多同志不了解：什麼是原則？什麼是屬於原則的問題，什麼是黨的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並抓住這些原則問題，這些關於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問題上的分歧，來進行鬥爭。他們理論水平

與政治經驗，還是格外的低下，他們還抓不到這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並爲了這些問題來進行爭論。然而他們又死死記住在黨內是要鬥爭的，不鬥爭是不對的。他們雖抓不到這些重大問題，不能從原則上提出問題，可是他們還是要鬥爭的。於是他們就只能抓住個別的現象，個別的問題，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來實行無內容、無原則的鬥爭與爭論了，並因此而達成同志間不團結，互相對抗，及組織上的分歧。這種黨內鬥爭中的惡劣現象，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

上述這些，是中國黨內鬥爭的一種偏向，是在中國黨內嚴重（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的一種偏向，是黨內鬥爭進行得過火，進行得毫無限制，走到另一個極端——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定原則上一致的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的獨立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其自勵性、創造性等）。這是由於中國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產生的。

在這裏，還要說到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鬥爭沒有被中國黨內的許多同志所注意這一事實。十月革命後，俄國黨內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的一派，他們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在以後又有關於工會問題的論爭。十月革命以前，在布爾塞維克內部雖也有過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召回派一派，但不久即被克勝，不如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左」派共產主義的嚴重，俄國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寧克服了。但在西歐各黨又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他們提出「不做任何妥協」的口號，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合法鬥爭，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左翼進行必要的聯合。在這種情形下，列寧就在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寫了「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一書，以矯正這種傾向。因爲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從前不相信無產階級可以奪取政權的，現在有了活的事實，給了右傾機會主義以致革命的打擊，就在這種情形下產生「左」傾機會主義，以爲革命可以不經過任何迂迴道路，一個早晨就可以勝利。這種情緒，中國黨內正是發軔，在某某時期內並且佔

了統治的地位。犯這種錯誤的人們，完全不注意列寧論左派幼稚病之書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對迂迴，反對等待，提倡少數鋒隊可以不經過大眾衆還沒有限得上來的事實，就實行冒險的進攻，反而罵其他的人爲「右傾機會主義」。一切組織上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而來的。中國黨內既在這些時期犯過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錯誤，於是在組織上的過火的黨內鬥爭就產生了。

因此，在中國黨內鬥爭問題上，如果可以這樣來分的話，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種偏向：

第一、是黨內的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

第二、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黨的組織上及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

第三、是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鬥爭。

以上三種偏向，在本質上說來是沒有甚麼區別的，因爲黨內無原則的糾紛和鬥爭及黨內的過火的鬥爭，與自由主義都不是馬列主義的，都是反馬列主義的表現形態，上述三種偏向，是僅僅其形式來分的。

這就是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的偏向。

三 機械過火的黨內鬥爭之表現

同志們！在上述三種黨內鬥爭的偏向中，第一種自由主義的偏向，我今天不準備來講，雖然我並不是認爲目前黨內自由主義的偏向不嚴重，目前反對自由主義必要，我也還不能相信同志們對於自由主義這一種傾向及其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表現，是已經徹底弄清楚了，我想許多同志是還沒有徹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準備講它，下次有機會時再講。我只提出黨內自由主義傾向

最近是有些發展。在許多地方已經成爲黨內鬥爭中一種主要的傾向。黨內鬥爭發展得愈快，因此就使得黨內許多錯誤的傾向，不良的現象，以及時常糾紛的糾正政策的規律也逐漸的顯現出來，這是很不好的，這是由於最近有大批的知識份子及新黨員加入黨內來，他們是帶着過量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到黨內來的，在思想上的政治上組織上都還沒有受到無產階級鐵的規律的鍛鍊；同時，過去犯過一左一傾錯誤及黨內過火鬥爭錯誤的許多同志，在今天的他們又反轉過來犯有傾錯誤，獨自由主義的錯誤，來駁斥一切黨的環境資產階級影響黨內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暗藏在黨內反革命份子，則用一切方法發展與擁護黨內的自由主義，因此就使黨內自由主義的傾向發展起來，這是我們在加強黨內的鬥爭中必須嚴格反對的一種傾向。比如有些同志，看到別人犯錯誤不說，怕人報復，好友朋犯錯誤不說，怕互隱瞞，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隨便批評，發牢騷，小廣播等……這些現象，在黨內是相當普遍存在的。

還有特別嚴重的一種現象，最近也在黨內產生，就是有一種人，生怕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缺點與錯誤，怕人告狀。一方面，他們不能禁止自己已經知道的錯誤，他們要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專禁止別的黨員向黨向上級報告及在會議上批評他，他們存了一些錯誤的不正當的事情，犯了錯誤，但他們不肯將錯誤揭露，以便改正他們的錯誤及缺點，他們諱避，他們不知道只有將錯誤揭露才能改正錯誤的真理，他們要隱蔽錯誤，把錯誤當作什麼寶貝還要珍貴的隱藏起來，如是他們就不只是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眼睛不敢說他們的錯誤！他們還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嘴不敢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錯誤，取消別人以完全正當的組織方式在黨內談話與批評的權利。他們恐嚇其他的同志說：「你敢於向上面報告，那我就會對你不起的！我要撻你的！撻你這個喜歡向上面拍馬屁溜溝子的東西！」「痛恨那些同志向上面報告及講過他們的錯誤的同志，而忘記在心，並要想辦法報復。這種現象，是完全失了黨員氣味的惡劣表現。他

們要與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員羣衆的聯系，以便你們能够在黨內爲非作惡。這種現象是應該格禁止的。

任何黨員看見其他黨員犯錯誤或其他一切不利於黨的事情，必須向黨向上級報告。不報告是不對的，報告是完全對的。禁止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自己的缺點錯誤，是完全非法的，黨內是絕不容許的。當然黨的領導機關在得到這種報告後，應調查清楚事實，審慎處理；而不能單憑一聞之辭，輕率隨便的處理。

目前黨內的思想鬥爭應該適當的開展，這是我們已經決定了的。因此，應該反對自由主義。在某黨的環節，犯自由主義錯誤特別嚴重的地方，應該根據事實，開展反對自由主義的具體鬥爭，克服這種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幾年前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舉出了黨內十一種自由主義的現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你們應細心研究，並遵從這篇文章來糾正與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同時在你們黨的建設的課程上，也會要詳細講到自由主義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它，我現在只來講第二三種偏向；因爲這兩種偏向是從來沒有人在黨內系統講過的。

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鬥爭，表現在一些什麼地方呢？表現在以下的一些事實上：

第一、在地方黨及部隊黨內，經常舉行所謂「鬭爭會」，甚至在政府機關及羣衆團體等非黨組織中也經常舉行這種「鬭爭會」。這種「鬥爭會」，是預先佈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爲了檢討工作。而是要打擊某某人，不是首先「對事」，而是首先「對人」鬥爭，主要的不是向某種不正確的思想與原則進行鬥爭，而是向某人鬥爭。所謂「鬥爭三和四」，目的就是要打擊某某犯了錯誤的同志。「鬥爭會」的實質，是一種同志的審判會，主要的不是從思想上去解決什麼問題，而是要促組織上去解決問題。去壓服某些敢於堅持自己不同的意見（這種意見不一定真正不對的）同志的，或調皮搗蛋的同志。而且在每一次「鬥爭會」對被鬥爭的人，大多數必有組織結論

●很明白的，這種鬥爭方式是不對的！

為什麼不對呢？

首先，如鬥爭會，這個名詞就不對，就不通。既有所謂「鬥爭的會」，那末是不是還有所謂「無鬥爭的會」呢？如果我們把某黨「會」認為是專門進行鬥爭的會，又把另一些「會」認為是完全不進行鬥爭的會，那就是兩種極大的觀念上糊塗！在這裏，證明許多同志是不懂得鬥爭的絕對性及普遍性的，是把鬥爭與教育機械的分開的。

黨內鬥爭的目的，是為了教育黨與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所以黨內鬥爭本身即是黨內一種不可缺少的教育；而黨內的教育也是一種黨內鬥爭，一種比較溫和的鬥爭。因此，教育與鬥爭是不能分開着的。鬥爭即是一種教育，教育即是一種鬥爭，機械的分開是不對的。

其次，這種鬥爭會，是黨內宗派主義及對幹部對同志實行錯誤的打擊政策之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是為了要打擊被鬥爭的同志，而不是為了要幫助、教育或挽救犯錯誤的同志。主要的是對人鬥爭，而思想上的分歧與對抗，反而被忽略了。因此，這種「鬥爭會」常常不能真正加強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分歧，加深黨內不團結的現象，無原則的糾紛，及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

至於在非常機械的團體中舉行這種「鬥爭會」，那更是不對的。

第二，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鬥爭形式，損壞現在：有些同志以為黨內鬥爭是鬥爭得愈兇就愈好，問題排得愈嚴重愈好，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名詞用得愈多愈好，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和態度愈險峻愈粗暴就愈好——講話的聲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兇，牙齒露出來愈長……：……就以為是愈好的，就以為這是「最革命不過」的了。他要在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中不講求適當，不講求分寸，不講求適可而止，毫無限制的鬥下

去。很明白，這也是完全不對的！

第三、有些同志還不了解：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鬥爭，是要在思想上去得一致，才能保持與加強黨的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解決問題以後，才能在組織上、行動上解決問題。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求得一致與解決問題，要去克服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勸正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轉變別人的思想，要去糾正別人久已相信的原則、觀點和成見，就不是那樣容易的事，就不是採用那樣簡單的辦法，三言兩語，或一場鬥爭會所能作到的。不是採用單純的壓迫手段與強迫辦法所能作到的。而是須要經過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與各種複雜的鬥爭，經過相當長期的教育與鬥爭及革命的實踐，才能够作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這樣來認識黨內鬥爭的實質，而是把黨內鬥爭簡單化、機械化、庸俗化，認為黨內鬥爭只是一種組織上的形式上的對抗，只是一種簡單的打架或者罵人，只是一種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求得真正的一致與解決問題。或者認為黨內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是可以這種簡單機械庸俗的辦法來解決的，很明白，這是完全錯誤的！

由於這些同志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克服黨內的分歧，去糾正某些不正確的傾向與現象，來保持或達到黨內的統一，而是企圖用一種簡單的組織上的辦法，用一種對黨員的壓迫手段，打擊政策與懲辦制度來達到或保持黨內的統一，所以他們就產生各種錯誤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方式的辦法。他們就不是細心的，周到的，從原則上去說服同志，而是採用一種單純的組織上的辦法。他們的方式，甚至行政上的辦法去壓服同志，嚇住同志，他們隨便對同志作組織結算，在組織上去噓問詞章，而用用資產階級的平均的法律觀點，慘痛的處罰黨內的同志。即是說不論何種黨員犯有過失的錯誤，不管其承認及改正與否，按照黨法均須給與處罰。這就形成黨內的懲罰制度。他們常常開展鬥爭的辦法，去開展工作，推動工作，故意去尋找「鬥爭對象」（黨內的

動志) 一作為機會主義的代表者。張開始鬥爭，犧牲與打擊這一個或這幾個同志，一般開始鬥爭，以推動其他幹部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務。他們故意找些鬥爭對象的缺點錯誤，以形勢的，片斷的摘錄他的大不妥當的言論行動，把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大妥當的言論行動又孤立起來看，當作就是這個同志的全部。把這個同志特別的缺點錯誤放大起來，着地構成機會主義的系統，在黨內同志中造成對這個同志極不好的印象，激動起黨內同志的復仇報復心理，向着這個同志來鬥爭。於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報復心理也發展起來，揭發他一切的錯誤缺點，任意提到頂刺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實，憑着主觀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論言，亂加這個同志以各種罪狀等等，結果是非把這個同志弄得昏頭昏腦不可救藥作了之後，他們還不大允許還繼續打擊的同志起來作任何的辯護。如果他有的辯護的話，那麼又說他故意辯護錯誤，承認錯誤不徹底等等，再加以打擊，不允許被打擊的同志在服從組織的條件下，保留意見，不允許向上級提訴。一定要被打擊的同志當時認錯。如果被打擊的同志一切都承認了的話，那末思想上、原則上的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又是不太注意的。所以在黨內也發生過這種事實：即某些同志在鬥爭中承認錯誤過多，爲了及這打擊起見，不如一切都承認好些。錯誤雖承認了，實際上他自己也還是不懂得。在這裏也就證明這種鬥爭方法不能培養共產黨員堅持真理的頑強性。

第四、將黨內鬥爭方法與黨外鬥爭方法不加區別地混淆起來。有些同志，將黨內鬥爭的方法機械的搬到黨外的共產黨的羣衆團體及機關中去使用，用黨內鬥爭方法，去向非黨幹部和羣衆鬥爭；另外有些同志用黨外鬥爭方法，對敵人對異己份子鬥爭的方法，來向黨內的同志鬥爭，用對付敵人與異己份子的辦法，來對付黨內的同志。一切挑撥離間，陰謀詭計都使用上來，行政上的辦法，例如如強迫、灌輸、監察、審判等也運用到黨內鬥爭中來。如有些同志在鍾奸汪偽投降賣國主義左的錯誤，來爭辯這是有將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嚴格區別開來的結果。是說黨的忠誠鬥爭

機關好作混濁的果。黨內也往往有敵人的奸細暗藏，對於這種暗藏的敵人，是必須根據事實進行鬥爭，把他們揭露出來與黨絕交的，但是與共產黨員犯錯誤須要進行教育性的鬥爭，完全是兩件事，必須把二者區別清楚。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是有密切聯繫的，但鬥爭的方法和鬥爭形式必須區別開來。

還有黨同志，其實這已經不能稱為同志，則公然依靠與假借黨外的力量來進行黨內鬥爭，向黨內互相惡感，如有些人倚仗他們一部份的坐作成績，倚仗他們的部隊和槍桿子，倚仗他們在黨中的信譽或其一部份的統一調子關係等，而向黨向上級機關進行鬥爭，要挾上級機關及黨接受他們的要索與意見，而黨則獨立作宣傳，黨宣言獨立，或者利用黨外的，甚至資產階級的、敵人的報紙雜誌及各報會議，來批評黨，向黨的組織機關，及某些同志和幹部進行鬥爭，很明顯的，這是與另外一些人倚仗黨的勢力去驅迫、命令、壓迫黨外的羣衆，去向黨外人進行敲詐勒索，是一種嚴重的錯誤，這些人是站在黨外向黨內鬥爭，因此他們雖尚掛着共產黨員的名，却已經完全離開了黨的立場，成爲黨的敵對者。

第五、我們黨內的許多問題都是在會議上解決，或經過會議解決，這是好的。但各個組織中，有許多會議是沒有準備與預先調查研究工作的，常常在會議上發生許多不同的意見與爭論，而一切會議又必由最負責的參加者來作結論，一切會議的結論又等於決議，在這裏也常發生許多矛盾，我看見有些會議上的爭論，最後逼到辯論或支部書記或其他負責同志來作結論。但這個負責同志自己是完全無把握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的，然而事情是逼來了，非作結論不可，否則不能作負責同志。這個負責同志只得來作結論，有的則表現非常狼狽與汗流夾背，和率把結論說下來，行這個結論也等於決議，事情就照這個結論決定下來。這當然是要發生許多錯誤的，有些同志，趁着他們對問題還沒有把握決定的時候，他們不肯說明自己還沒有把握，還要求一個考

應與研究的時間，或向上級請示的時間，而要顧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說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隨便決定下來，結果常常不是正確的。這種情形，也應該糾正。

我們一般同志對一切的問題，應該是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不要一強不知以爲知之。黨內的問題，不是依從積習所能解決的。一切會議應該有結論，但不能決定的事情，或尚有疑問，尙未弄透的問題，就不應隨便決定，決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已相信的，如果自已還無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來再加以研究或請示。會議的結論，不一定是參加會議最負責的同志來作，雖作報告，在討論之後，即由誰作結論，但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定等於決議，會議的決定可以和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樣。在蘇聯共產黨內的作風也是如此的。

以上這些，就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一些重要的表現。

我在以上所說的，當然是一些最壞的典型。不能說我們過去的和現在的黨內鬥爭普遍都是如此的。但這種黨內鬥爭的方式確實是存在的，且曾經在一個時期是佔着統治地位的，成爲主要的黨內鬥爭方式。

在這種不正確不恰當的黨內鬥爭之下，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什麼結果呢？是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以下一些惡果的：

一、助長了黨內的家長制，個別的領導者及領導機關，在這種鬥爭方式之下壓迫着許多黨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形成個人或少數數人的獨斷。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長了黨內極端民主的傾向及自由主義的發展。許多黨員平時不敢說話，不敢批評，表現黨內極端形式上的和平與統一，但是到了矛盾無法繼續隱蔽下去的時候，一到情況嚴重與錯誤暴露出來以後，即又亂批評鬥爭一場，形成爲黨內的對抗與分裂及組織上的紛擾，很難收拾。這也就是黨內家長制的反面表現。

第三、影響黨內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確的建立，黨內民主生活的不經常不正規，或極端腐敗。

第四、阻止黨員同志們積極性、自動性及創造性的發揮，剝削黨員對黨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影響同志們不敢積極負責，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創造，本細心去考慮研究問題與境况，造成他們照辦公事，人云亦云的作用。

第五、破壞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無原則派別鬥爭的發展，造成黨內害怕批評與鬥爭的心理，養成某些同志「獨善其身」的保守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六、信任派奸細反革命份子以破壞黨的更多的機會，給反革命造成我黨以更多的口實。托派奸細份子特別利用黨內的矛盾，不大正確的黨內鬥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來爭取那些受打擊的對黨不滿的份子。而反革命則利用黨內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來進行宣傳煽動，影響黨外的同情者及黨內不穩定的成份來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黨內的團結與統一。

上述這些惡果，是在黨內曾經造成過的一並且還存一部份遺留到現在尚未把它們消除，這種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方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曾經造成黨內生活不經常的現象，給黨的損失很大。現在我黨高級領導機關中，雖是已經糾正過來了，在全黨現在也不是「一種統一的鬥爭方式」，但在某些中下級組織中，在某些個別的組織中，這種鬥爭方式則至今還未糾正，這種普遍的或多或少存在着、繼續着；因此，這些組織中的生活仍然是不經常的。因此，我們必須嚴格指出這種偏向，以便使我們的組織中澈底肅清它，以便我們的同志不再重複這種錯誤，以便正確的切實的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前進。

四 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

同志們！我現在來講黨內鬥爭中另一種偏向——黨內無原則的鬥爭。這種現象在中國黨內，是特別普遍與嚴重存在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所謂「閒談運動」，但我想，還沒有中國黨內這樣嚴重吧。所以我們對這種現象，必須使同志們認識清楚，並採取必要的辦法來對付，否則對黨內的團結和工作的妨礙是太大了。

什麼是黨內無原則糾紛與無原則鬥爭呢？

我認爲黨內的以下幾種糾紛和鬥爭是屬於無原則的，即是離開我們黨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利益之共同立場和原則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整個黨的利益上來提出問題，來和其他同志進行鬥爭，而是站在個人利益或派別利益的立場上來提出問題，來和黨內其他同志進行鬥爭。就是說，他們在進行黨內鬥爭中的立場是不正確的。因此他們對於問題的觀點，處理方針和辦法，也是不正確的。一切事情的處理，只要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有利，他們就贊成或主戰；如果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不利，他們就反對，就不贊成。至於是否對黨對革命有利？他們是不管的，或擺在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因此，這種人主張什麼或反對什麼，都是沒有原則的，離開黨和革命的原則的。或者說：他們的原則，不是黨的原則與革命的原則，只是他們個人利益的原則，如果每一個人都以自己個人利益爲原則的話，那末，各個人的利益與原則，必然矛盾，必然互相鬥爭。

比如，在你們中就有人爲了伙子的問題，馬匹的問題，吃飯穿衣及生病打針的問題，沒有提昇自己職位的問題等，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和鬥爭，就是屬於這種個人的無原則的問題。同志們不

是一般擺出伏子、馬匹、吃飯、穿衣及打針藥膏怎樣支配的原則，才對黨對大家有利，而黨友與校採取；而是這樣提出問題，爲什麼不給我伏子馬匹？爲什麼不給我打針？爲什麼不提升我的職位？爲什麼不給我好的飯吃、好的衣裳？一切以「我」個人爲中心、從「我」個人的立場出發，在黨內造成糾紛，進行鬥爭。那末只要給個人滿足了，即使支配得不合理一點，他也可以不管的。這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

又比如同志們反對浪費吧！有些同志是站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立場上來反對浪費的，因此他們提出各種違反節約原則的浪費現象來加以批評反對，並提出節約的意見要黨採取。這是很對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立場上來反對浪費。因此他們就這樣提出問題：某人浪費了多少，某人某人又吃了什麼，穿了什麼，用了什麼；……爲什麼我就不能這樣吃、這樣穿，這樣用呢？難道我的資格不老嗎？對黨無功嗎？因此他在反對浪費的口號之下，起來鬥爭了。原因就是別人浪費了，而他自己還沒有浪費到。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

比如在院裏，曾經規定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員有少數的薪水，如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政府機關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要得到這一點薪水，不允許他們去的時候，他們就在反對政府機關人員有薪水的口號之下起來鬥爭了。他們也並不是在原則上提出應如何來規定政府機關人員的生活，來加以商討。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爲了認真的事情弄好，甚至爲了認真的事情弄壞，或其他目的，來在黨內起糾紛，進行鬥爭。目的是不正確的。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比如有些同志爲了個人變出風頭，爲了個人地位及個人面子，甚至爲了報復別人以洩恨，在黨內鬧糾紛，和其他同志鬥爭，以搞亂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計劃，破壞黨內的秩序與團結，而不顧及當時的情況與條件等，就屬於於這種無原則鬥爭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要黨糾納，或要黨放棄，而是想自己向黨請願或事關黨與黨外問題進行鬥爭，爲了一時的精氣神爲黨發脾氣舒憤懣，而要罵人和黨憤，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

另外有些同志由於他們的經驗與理論水平低下，不能從原則上提出問題來爭論，而只是在一些個別的零碎的問題轉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中，不涉及原則的日常政務問題上，來和其他同志作這不妥協的爭論，但並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則問題，因此這也是一種不應堅持鬥爭的無原則問題。比如，有些同志對於某一次的問題，某一次的行動或某一次鬥爭形式，某一個組織的方式等發生相爭對立的意見，而不涉及到一般的原則問題或對某一般的行動方針或一般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各持己見的不停止的爭論下去。他們的問題提得不正確，因此常常不能有正確的結論，或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爲一種無結論的清談。

第四、是不擇手段，不依照正常的組織手續來進行黨內鬥爭，在黨內無原則的拉攏或打擊同志，在同志間進行挑撥離間，陰謀詭計，及陷害同志等，或者當面不說，背後亂說，對黨不負責任的亂批評、亂廣播及造謠、撒謊、誣毀同志等。

以上這些，都是無原則的鬥爭。其次，還有一些同志在原則鬥爭中夾雜無原則鬥爭的若干成分，或者在原則鬥爭的大旗下掩護下進行無原則鬥爭的。另有些同志特別着重地注意某人與某人爭吵，某人與某人的關係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們爭論的實質。

黨內這一切的無原則鬥爭都是不好的，對黨有害無益的。同志們又問什麼是原則？什麼是不涉及原則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什麼是日常政務問題？以及爲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不應堅持己見，而應與黨內持有別種意見的人在一切妥協？同志們！這些問題確是應該弄清楚的問題。

什麼是原則呢？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來講，所謂原則就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發展法則。相同的事物有大體上相同的發展法則。我們所謂法則問題，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法則作為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方法問題。如果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法則有錯，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有錯，那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如果我們認識某一類問題的發展法則有錯，那末我們處理這一類問題的方法也必然要發生錯誤。所以我們對於原則問題是不能馬虎的。如果在原則上發生錯誤，那就不只是要發生個別的錯誤，而會發生系統的、一般的、一系列實際問題上的錯誤。

什麼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日政務問題及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呢？

這大半是一些個別的問題，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比如我們說，要發動與組織黨委是三個機關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而發動與組織黨委須果中由黨委團體來領導，部隊也應該協助與參加黨委工作，這些都是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那我們在原則上都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有的同志主張將部隊的指揮部及兵運部暫時取消，將這些工作人員編到黨委團體中去工作；另有的同志則主張部隊兵運隊不兼取消。有的同志主張分部辦事，另有的同志主張分五部辦事，這就是純粹實際性的問題。都不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我們說，今後抗戰，今天的一般戰術原則是分散的游擊戰爭。如果大家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分歧的話，那末就是我們沒有戰術原則問題上的分歧，但有一次由於各種情況的逼迫或者由於對我特別有利的情況發生，我們某個指揮員打了一次勝利的或失敗的運動戰，那末，這也是不涉及原則的實際戰鬥。只要這個指揮員沒有存在敵後打運動的原則的觀點，那末即使這一次二次戰鬥是錯誤的，也只是個別的錯誤，或者是由於特殊情況的發生，這個指揮員打得

不錯。所以我們就不要在這些個別的純粹實際的問題上，堅持己見，爭個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軍裝備條件下，原則上是不應進攻敵人的堅固工事與中心城市。如果對於這一個原則我們沒有分歧的話，那末，某一個工事，某一個城市，因為有特殊的條件或有特殊的必要，我們又去打下來了，這也是不涉及到原則問題的個別實際問題。但如果因為打下了這一個工事，這一個城市，就說一切敵人工事與敵佔城市我們都可以去打，這就成為原則問題了。在內戰時期，曾有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指揮紅軍剿某些大城市進攻，這就是涉及到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原則是他們去打這些大城市是原則上主張紅軍應進攻大城市進攻。是這種涉及到原則問題的實際問題上，我們就不應該在原則上妥協，而仍應在原則上主張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體的實際的問題，常有幾個解決的辦法。由這裏到那裏，常有幾條實際可走的道路。這些辦法，這些道路，對我們當時的情況又各有利弊。有的辦法和道路對我們是更有利的，但也會有危險性，爲了慎重起見，我們又不如採取某種辦法知道路中所要在這些具體的純粹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如我們發生有分歧的意見，總要妥協，我們就要善於妥協，善於讓步，善於接受與向看別人的意見。善於與人合作，然後事情才能暢快的辦理，問題才能爽快的決定；而不應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要別人放棄意見，總是要別人來將就自己，總是要別人照自己的意見辦理。這樣反而拖延問題的解決，妨害工作的進行，增加黨內糾紛與清談的傾向，妨害同志間的互相團結。這就是爲什麼在處理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應與黨內也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緣故。

由此可知，什麼是純粹原則問題，什麼是實際性質的問題，
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鬥爭目標及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的問題，就是那些不關涉到我們的戰略及策略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一切具體的實際性質的問題。上面所舉的各種例子，

就都是這樣的問題。比如我們今天的鬥爭目標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主要的鬥爭方式是武裝抗戰與其鬥爭方式的配合。戰略是聯合所有一切抗日黨派階層共同抗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施。如果我們對於這些原則問題沒有充分的認識，那末，今天在抗戰又遇到東京，或從東京回來，胡漢民又去職，換上了齊燮元，後天日本駐華軍的總司令又換了人，再後天我們在那裏又粉碎了敵人的掃蕩及那裏的增援，那末，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的估計和處理，只要不違背與涉及到上述的原則，怎樣處理都是可以的。

又比如，日本進攻中國，中國應否抗戰，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對於抗戰的總方針沒有分歧，那末，在何時開始全國的抗戰，這是次要問題了，可以妥協的。但國民黨在九一八、一二·九、二八也不抗戰，在冀東事變、華北事變又不抗戰，當時我們與國民黨在抗戰問題上的分歧，並不是抗戰時間的問題，而是國民黨是否抗戰的總方針尚未決定。當我們必須堅決的鬥爭。但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國民黨抗戰的總方針已經決定了，並實行了，故我們亦不必分追究以前不抗戰的事實。但在抗戰後對於如何抗戰，如何爭取抗戰勝利問題，我們與國民黨基本上還是不同的。這也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西安事變，是關涉到對國民黨的處理與抗戰的一個重大事變，所以中央堅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當時有些同志反對和平解決，是錯誤的。但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他們並不是犯了解原則的錯誤。因為他們在原則上是贊成國共合作的，他們只是對於西安事變如採用另一種解決辦法，或不解決，國共也可以合作，或更可以合作，他們只是犯了個別的問題。因此後來他們也就很容易的糾正了這種錯誤。

總之，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總原則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一切要擺脫這種總原則。如違反這種總原則的主張、意見和行動都是不對的。各種原則之中，又有次原則與小原則之分。

我們的規律，是部份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小原則服從大原則。在一切原則問題下的分歧，是不能調和妥協的，必須徹底爭論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就不必死不要臉，就不必過分着重的鬥爭與爭論。否則也要妨礙工作與妨害團結的。

我曾聽見一種同志說：在黨內鬥爭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在組織上即使錯誤一點點，也不要緊的，是次要問題。因此他認為在黨內鬥爭中可以採用各種不合組織紀律的手段向反對者鬥爭。這種說法，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他把正確的政治路線與正確的組織路線對抗起來看，他不知道：搞亂黨內的秩序與組織，就是犯了一個最嚴重的原則的錯誤，特別在今天防害與破壞黨內的團結和統一，就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最大的妨害了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地原則錯誤更加嚴重的錯誤。在這裏，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我們的同志就要善於比較，善於區別各種原則問題在當時對黨的利害的輕重關係，根據小原則服從大原則，部份服從整體的法則，來決定在什麼原則問題上應暫時讓步，不堅持，在什麼原則問題上則堅持不讓步。爲了保持黨內的團結和統一，有時對於某些關係不大重要不大緊急的原則問題，我們也是應該和黨內持有別種意見的人，暫時妥協的，暫時不提出這些問題，不在這些問題上堅持爭論，而着重在當時關係重大的緊急的問題上。這當然不是原則上的調和與中間路線，而是實際行動上的妥協，及服從多數決定。

有些同志在蘇聯學習，對於聯共黨內鬥爭中許多好的東西，他們是沒有或很少學習到的，但聯共黨內鬥爭中那些壞的東西，他們倒學習了不少回來，他們的本質就善於反視與學習那些最壞的東西。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以上就是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問題。
黨內無原則鬥爭，以及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呢？他們的根源是什麼

呢？還是由以下一些根源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黨內同志的理論水平。幹運很低，許多方面的經驗還不够，全黨的領袖與中心，很久沒有實際的形成，黨在各地方的領袖與中心，則到今還很少實際的形成。

第二、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多，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瘋狂性，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報復性，經常影響到黨內鬥爭。

第三、黨內民生活活不正常，同志間客觀的相互商討問題和作風未形成，組織的主觀的判斷與處理問題的作風，仍嚴重的存在。

第四、投機份子混入到黨內來，以及某種投機心理在黨內一部分同志中存在。他們常常爲了證明自己的「布爾塞維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爲「左」要比右好點，或者爲了打擊別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派遣好細反革命份子混入到黨內來，利用黨內鬥爭來破壞黨。內奸派遣常常在黨的旗幟掩蓋之下故意打擊某些同志，在打擊之後，又要另一個內奸派遣份子去被放這些被打擊的同志作內奸加入托派。

以上這些就是產生黨內鬥爭中上述各種偏向的根源。

我們的黨從最初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作得對的，恰當的。因此，我們的黨在許多次的黨內鬥爭中，都有成績，都使我們的理論水平在些提高。不可否認的，這些批評與黨內鬥爭，是推動我們黨進步的原動力，如果沒有他是不可行的。然而，我們同樣的不可否認，在我們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是存在着一些極其典型的偏向和錯誤。在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進行得不正確的，因此就使我們在過去黨的鬥爭中費了很大的代價。因此，我們在今天就應該如何的來檢討這些如何使過去費去

的很大代價使它不是虛費的，如何從研究過去黨的鬥爭的歷史教訓中來求得黨的大的進步。黨的進步還不夠大，成績還不夠多，並且在黨內所引起的痛苦太多，代價也費得太大。以很大的犧牲，很大的代價和很多痛苦，換來了不夠大和不够多的黨的進步與成績。這就是我們過去黨內鬥爭的基本總結。

假定我們過去的黨內鬥爭都是進行得很正確的，假若在黨內鬥爭中不發生或者避免了上述各種偏向與錯誤，那末，可以肯定的說：我們會要獲得比今天更大的成績，黨的進步，也會更大，痛苦與代價也會更小，以更小的代價和痛苦，獲得黨內鬥爭更大的成績和黨的更大進步，這就是我們今天從研究中國黨內鬥爭的歷史教訓中所應確定的今後黨內鬥爭的方針。但這就需要我們徹底糾正過去黨內鬥爭中的各種偏向與錯誤，須要我們切實的去進行黨內鬥爭。

五 怎樣進行黨內鬥爭？

同志們！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就是怎樣來正確的、適當的進行黨內鬥爭呢？

關於這個問題，聯共黨及各國黨均有許多經驗，中國黨也有很多經驗。列寧、斯大林有很多指示，黨的中央也有很多指示。關於這些，同志們應該去細心的研究，將來在黨的建設上也要講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這些。我只就中國黨內鬥爭的經驗，提出以下一些意見來，作為同志們的參考。

第三，首先同志們要了悟，黨內鬥爭是一件最嚴重最負責的事。我們必須以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來進行，而絕不可以草率從事。必須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確的黨的立場上，完全是為黨的利益與工作的進求，及幫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與理解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來進行。必須自

已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問題弄清楚，實行系統的調查、研究，何時，還必須是有組織的、有領導的，有準備的去進行。

同志們應該知道：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才能糾正人家不正確的立場。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後才能矯正別人的不正派。所謂「必先正己，然後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動搖，然後才能幫助動搖的人，克服人家的動搖。

只有自己正確的原則、正確的理論，然後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原則與不正確的理論。

只有自己對於原則問題的明確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確，只有自己瞭解問題的實際材料更多，更有系統的研究了問題，然後才能給其他的同志並給黨以更多的幫助。

如果有同志不是這樣，如果自己首先站不穩在正確的立場上，沒有把握到正確的原則，沒有按照原則去觀察客觀情況與系統的研究問題，甚至只有個別的缺點，與在某些地方的不够明確，那在黨內鬥爭中都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東西。如東環要魯莽的去鬥爭，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確的路上去！

只有客觀的鐵的事實，只有在實踐中已證明了的經驗，只有真理，能够戰勝一切。

我們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不是爲了要削弱黨的組織與團結，削弱黨的紀律與黨的威信，妨礙黨的工作的進行；相反的，是爲了加強黨的組織與團結，提高黨的紀律與威信，推動黨的工作的進行；因此，黨內鬥爭不能任其自然的發展，形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在黨內既不能容許家長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許極端民主現象的產生。這是黨內生活不經常的兩個極端的表現。

黨內鬥爭，是應用對黨對革命最高的負責態度來進行的。

第二、同志們要瞭解黨內鬥爭基本上是黨內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鬥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對抗。思想原則上界限的明確劃分是最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在鬥爭的方式上，在說話

與批評的態度上，應該儘可能的不對抗，儘可能採取溫和的方式來商討和爭論，儘可能不採取組織手段及作組織結論，儘可能完全採用談話、坦白、正面教育的態度去進行，去求得思想上、原則上的一致，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在十分必要的時候，才可以採取對抗的鬥爭方式與組織手段。黨的一切組織，在適當的限度內，都有完全的權力對任何堅持錯誤的黨員作組織上的結論。黨的紀律的執行與組織手段的採用，在一定的情況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種手段不可輕易採用，不可濫用，單是在組織上處罰同志多，並不能提高黨的紀律。黨紀律，黨的统一，主要的也不是靠處罰同志來維持（如果要這樣才能維持，那就已是黨的一種危機了），而主要的是依靠黨的思想，原則上的真正一致，依靠大多數黨員的自覺性來維持的。我們只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最後的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組織結論是容易作出來的。我們不要一分鐘可以決定開除某些同志的黨籍，或宣佈自己脫黨。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堅持，對抗與爭論，和同志們對於黨的組織上的服從，對於多數與上級的服從，是不可分離的；否則，就沒有黨的統一與行動上的一致。同志們決不可以因為在原則上堅持已見，就在組織上與黨對抗，就不服從多數與上級，就去自由行動，這是違反黨的基本紀律的。

原則上，思想上的對抗，與組織上方式上儘可能的不對抗，是我們應該採取的黨內鬥爭的正確方法。許多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一方面沒有思想上與原則上明確的對抗與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組織上及鬥爭方式上又對抗得一塌糊塗，鬥爭得一塌糊塗，爭得面紅耳赤，罵的狗血淋頭，鬥得兩方面不見面，仇恨種下很深。然而在他們之間竟找不出原則上、思想上的明確分歧來。

第三，對黨的組織、對同志、對工作的批評，要適當、要有分寸。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有布爾什維克的尺度，一切過分的批評，擴大人家的錯誤，濫加別人的大帽子，都是不對的。

黨內鬥爭，不是鬥得愈厲害愈好，而應有適當的限制，應講求適當，「過」與「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與批評別人的錯誤要拿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問題，給以系統的明確的解釋，才能解決問題；而不要枝枝節節的搜集人家許多錯誤的現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實，簡單給以暴露了事。這會使人感覺你故意找他的錯誤，攻擊與打擊他。

當你們估計或批評某個同志時，你們不應僅僅指出他的缺點錯誤，當作他的全部。你們還應指出他的成績、功勞、長處及他正確的主張，即使他的主張只有一點或一部份是正確的，你們也必須替他指出，不可抹煞。這樣才能給這個同志以全般的估計與批評，才能幫助他進步，使他服氣。

適當的批評，適當的態度和適當的方式，反對「過」與「不及」，這就是我們在黨內鬥爭中所應採取的方法。

第四、在黨內外一般停止「鬥爭會」的舉行。應從總結工作、檢查工作中，來指出各種缺點錯誤，應該首先「對事」，然後「對人」。應該首先把事實弄清楚，把問題弄明白，把錯誤與缺點性質、嚴重程度、產生的原因弄明白，然後再去指出這些缺點錯誤的負責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誰負責，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錯誤的負責人。只要犯錯誤的同志不是有意，並且真正在了解錯誤，改正錯誤，那我們就應該歡迎，就不應再斤斤計較。在黨內鬥爭中對幹部與同志的打擊政策，攻擊別黨與打擊別人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與剝削階級對勞動階級的鞭子政策，嚴追政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我們的政策是同志間的互相幫助與互相檢討。

對於某些特別調皮搗蛋、經常違反決定違反紀律、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同志，對於他們，原則問題還說不上，也說不通的時候，那末，個別的舉行一些同志審判會，也並不是不可以的，有

時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普遍化就是不對的。

第五、必須給被批評被處罰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訴的機會。在鑑定同志及對同志作組織結論的時候，通常均應通知本人，當面作結論，如果他不服，在經過辯論之後，應向上級申訴（一切在處罰後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願上訴，黨的組織亦應代他上訴）。任何黨的組織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處罰後向上級申訴。黨員的上訴權，不能剝奪。一切的上訴書，任何黨的組織不能扣留。關於思想原則問題，黨員并可越級直接向中央或高級黨委上訴。不過上訴同志應該在下面充分說明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分歧的意見何在？弄清楚之後，才去上訴。不能在下面不說，到上面又亂說，隱混上級，企圖取巧。一切案件上訴之後，決定權即在上級，上級黨委可取消、或減輕、或加重下級黨委對同志的處罰。

在思想原則問題上，經過爭論之後，如果還未在本黨內最後的取得一致，是可以通過多數決定的。在多數決定之後，少數同志如果還有不同的意見，在組織上行動上絕對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是有權利保留自己意見的。

一定數量的下級黨委或同志要求上級黨委及領導機關召集適當的會議檢查工作的時候，只要有可能，上級黨委應該召集會議來檢查。

第六、應使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有明確的界限，同時建立適當的聯系。不要將黨內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外去使用，也不要將黨外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內來使用。更不要利用黨外的力量與條件來向黨內進行鬥爭與恐嚇。一切黨員要嚴重的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暗藏的托派奸細和反革命份子利用黨內的矛盾和鬥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一切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要使這些份子所利用。這只有嚴格的遵守黨內紀律，及正確的進行黨內鬥爭，才能作到。

在黨內，只能允許合法的鬥爭，只能允許思想鬥爭，一切違反黨章黨紀的鬥爭方式，都是不

能允許的。

第七、禁止黨內的無原則糾紛。這須規定以下的一些辦法：

一、一切黨員，對黨的領導機關及各個黨的組織，如有意見，只能向相當的黨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在羣衆中亂說。

二、一切黨員，對其他黨員及黨的負責人，如有意見，只能當面批評或在一定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亂說。

三、一切黨員或下級黨委對上級黨委如有意見，只能向上級黨委提出，或要求召集會議檢查，或向更上級的黨委控告，不允許亂說，或向下級傳達。

四、一切的黨員如果發現其他黨員有不正當的行為及危害黨的利益的行為時，必須向相當的黨的組織報告，不得隱瞞或互相包庇。

五、一切黨員應大家提倡正氣，提倡正派，反對邪氣，反對一切不正派的言論及行為，對於那些喜說閒話，喜歡廣播，喜打聽人家的秘密，喜造謠言的黨員以嚴重的申責。黨的領導機關應該隨時通令：禁止黨員相互談論某些一定的問題。

六、各級領導機關應該隨時找那些喜歡說人閒話、喜鬧無原則糾紛的同志來談話，給以糾正及警告或其他處分。

七、各級黨委應尊重每個黨員提出的意見，應經常召集會議，討論問題，檢討工作，給黨員以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

對於無原則糾紛，應該一般的禁止，不應去判斷是非。因為是無原則糾紛，所以是非可以判斷的。

當着我們去解決同志間無原則糾紛的時候，決不要單從糾紛的本身去解決，而應該去檢討屬

總結那裏的工作，正面的原則的去提出那裏今後的任務、工作方針、路線和計劃等。在這種總結任務、方針、路線和計劃中，批評到某些同志不正確的意見。然後徵求同志們的意見，是否還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同志們還有不同的意見，那就變為原則的爭論，把同志們的無原則爭論提到原則爭論的高度。如果同志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了，就要求同志們大家在這種總結、任務和方針之下，團結起來，一致為完成這種任務與計劃而鬥爭。其他一切的無原則問題、要求同志們拋棄。應該從總結過去的工作、解決當前的任務、推動當前的工作中去解決無原則的糾紛。否則，無原則糾紛是不能得到解決的。我們決不要用審判官的態度去解決無原則糾紛，這是無法判斷、無法解決的。如果你判斷不當，雙方都是有不滿意的，糾紛會繼續存在的。

至如某人對某人信任不夠，某人對某人尙有若干懷疑等等，這些問題一般不應提出來討論，因為討論是無益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只有在工作中、鬥爭中、實踐中，才能解決，才能證明某人是可信任的，某人是無可懷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鬥爭中夾雜了若干無原則成分，那末我們只着重和他討論原則問題，無原則問題不應着重去討論。否則，就會淹沒原則問題。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鬥爭的掩蓋之下去進行無原則鬥爭，那我們一方面應指出他在原則上對的方面，不要以人廢言；同時也應適當的指出他的立場與手段的不正確，以免將原則鬥爭引上無原則鬥爭。

總而言之，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與鬥爭。在黨內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否則不行！道理講清楚了，一切都好辦，都容易辦，我們要在黨內養成講道理的作風。判別各種道理是否正確的尺度，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從整個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張，對於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

有利的，對整個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長遠有利的，都是對的。不利的，都是不對的。無道理可講的鬥爭，講不出道理的鬥爭，就是無原則鬥爭。不講道理，或講不清道理，都是不對的！都不能得到正確結論的，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道理講清楚了，最後還不能得到一致的話，那末誰個差些反黨，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對於堅持錯誤的同志，採取組織結論就有必要了，問題就好解決了。爲了要講清楚道理，要能講清楚道理，黨內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靜氣互相商討的作風就是必要的。虛心學習，提高同志們的理論水準，弄清整情況，調查清楚事實，細心研究問題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意、主觀主義、人云亦云、脫離實際、不在清楚事實……：是絕不能講清楚道理的。既不講道理，或講不清道理，結果就只有依靠威權、依靠手段，依靠組織上所付予的權力，甚至依靠欺騙，來解決問題了，黨內民主就更無必要了。因爲黨內民主，就是爲了大家來把道理講清楚之後，以觀一致行動的。

我在這裏所謂之「道理」，當然不是那些空洞的與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實際事實與被實踐所證明了的真正的道理。某些知識份子是好講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們不要事實也可以講一大篇，從檯下可以說到天上，這是一種空談、黨八股，對黨對革命是只有害處毫無益處的。所以在提倡講道理的作風中，又必需反對空談與黨八股，提倡那些從實際出發的又是爲了實際的、客觀的唯物的道理。就是說：「我們的道理是唯物的」。

一切要講道理！不講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講錯了也是不行的。空談更是不行的！這當然有些爲難！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布爾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是講道理的，是真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並且能好好的和別人講道理的一種人，而不是整不講道理的、無理性的鬥毆家。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們同志應該依照這些方法去進行黨內鬥爭，去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去檢查每一個黨員特別是幹部的黨性。使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進一步的鞏固起來。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六 關於黨校內部鬥爭的檢討

根據我上面所講的來檢討黨校內部最近的一些鬥爭，就很容易了。爲了幫助同志們學習起見，對黨校最近的鬥爭加以詳細的檢討，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

關於你們第一班的鬥爭問題（略）。

關於你們第二班的鬥爭問題，特別是女同志間的鬥爭與糾紛問題。

第二班的女同志是相當多的，其中一部份是已結婚了的，另一部份尙未結婚。就在已結婚與未結婚的女同志間發生了嚴重的糾紛。

有同志說：黨校是「老婆廠」。大概是這位同志要求入黨校而組織未給予爽快的批准，因而有些氣憤說的。很明白，這是一種完全無原則的、侮辱黨校的說話。是一種無聊的話。

許多結了婚的女同志到黨校學習，是我提議的。我會經向黨中局提議：凡與我們團以上的幹部結婚的女黨員，均須進黨校（各地方的及黨中局的）學習。我自什麼有這種提議呢？

因爲我鑑於二十年來黨內結了婚的男女同志之間是大多數弄得不好或很不好。因而妨礙了黨的不少的工作。這中間的原因，固然有很多，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女同志來担負。但女同志的思想意識落後（大多數是比男同志更落後的），黨性不強（大多數比男同志更不強），是最大的原因之一。當然，就是這一點，主要也不由女同志本人來負責。女同志的住環境條件及黨與社會

，都要負責的。特別在最近，結了婚的男女同志之間發生了不少的問題。這種問題的發生，對黨的損失是很大的。一個人不好，要妨害兩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好，還可推動另一個人進步。爲了黨的利益，也爲了男同志女同志的利益，所以我有這個提議。讓這些女同志到黨校學習，在黨性及思想意識上加強她們，並培養她們一些工作能力，使她們可能逐漸成爲黨的幹部，這對女同志是好的，對黨對男同志也好，對其他的同志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好的。爲什麼要反對呢？

如果同志們有理由反對我們這個提議，那是可以的。任何黨員都有平等的權利向黨中局提議要求黨中局否決我的意見。如有同志這樣從原則上來提出意見，那是完全正當的。如果黨中局否決了我的提議，那我只有服從大家的議決。可是同志們不這樣作，而要在下面陰一句陽一句的批評，反對與譏諷，那就是不對的，非法的，那就是不能允許的。要在黨內禁止的。

在你們結了婚的女同志中，個別的表现有些驕傲及生活上的特殊，這當然是不對的。你們在生活上應該和大家一樣。在我們黨內，一切非份的享受，對黨員都不是作光榮的事。艱苦奮鬥，才是我們黨世間名的光榮。驕傲是更不應該的。你們和我們的幹部甚至最負責的同志結婚，你們除開在學習方面取得某些便利的條件之外——對一個黨員來說，你們還得了什麼可以值得驕傲的。除了轉看你們農村麼也沒有得到的。不論任何黨員，驕傲都是不好的。驕傲才是共產黨員的美德。

但你們未結婚的女同志就和已結婚的女同志分出明顯的界綫，對抗起來，譏罵她們爲「太太」，一切對她們特別苛刻，甚至對某同志用兩個口杯吃飯漱口，某同志有三件或四件襯衫替換，某同志說話聲音特別小，某同志走路的脚步特別輕……都要拿出來批評和鄭重其事的鬥爭一下，甚至因此鬥得面紅耳赤，互不講話。這是何苦來呢？除開暴露你們的宗派主義和黨後意識面外，還說說你們什麼呢？這是一種無聊的無原則的鬥爭。

如果結婚的女同志叫「太太」，那末，除開「太太」這個稱呼以外，你們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適當的稱呼呢？我們今天來結婚的女同志，將來不結婚嗎？今天你們不是「太太」，明天你們豈不也是「太太」已乎哉？！今天已結婚的同志，在一年半載甚至幾星期以前，不也是末結婚的嗎？爲什麼結了婚的同志就這樣值得可恨呢？就需要你們這樣來鬥爭呢？

有人似乎覺得這些女同志不該和我們的幹部及負責同志結婚，認爲與負責同志結婚的女同志是更可恥可恨的。這有什麼道理可講呢？難道我們的幹部與負責同志就不應該結婚嗎？難道女同志就不能和幹部與負責同志結婚嗎？難道這與你們未結婚的同志有什麼不好嗎？如果你們認爲與幹部及負責同志結婚不好，那完全有你們的自由，你們有本事，去找戰鬥員結婚好了。如果你們將來也要找一個所謂「配得上」的幹部來結婚的話，那末你們今天又何苦來這樣一着呢，你們豈不怕人家將來也照你們的樣來反對你們嗎？你們何不也留點餘地呢？如果有人看見了和負責同志結婚的女同志，眼睛裏面就有些發紅的話，那豈不是有點更不光榮嗎？

有同志說：我們這裏黑暗。大概我們這裏是有些黑黑吧？那麼什麼地方又光明呢？你如果認爲在敵人漢奸那裏光明，或在國民黨那裏光明，你就到敵人漢奸那裏去好了！你就到國民黨那裏去好了！你又何必到這個「黑暗」地方來呢？

有人說：我們這裏還有些封建思想。是的！我們這裏是有些封建思想的，而且可能還不少。在一個半封建勢力佔優勢的農村社會裏面，其他地方的封建思想，我看也不會比我們這裏更少。而且這種封建思想，還不是一下可能飛掉的。我們這裏有個特務員硬不肯去拿女同志洗過澡的盤子，可是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飛機，反共派的機關槍，都是不怕的，可以向其沖鋒。但他硬拍女同志的洗澡盆，你有什麼辦法呢？

總之，你們是一場無原則鬥爭。黨政的職支部不能解決，要我來解決，我有什麼解決辦法呢

使你們雙方滿意呢？我只有一句話：你們不應該鬧。不應該鬧而要鬧，就是無聊！就要禁止！黨費了很大的力量要你們到黨校來學習，你們不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以及革命運動的各種原則，你們不去好好學習，在敵人後方吃了人民的救國公糧，你們無事做，無聊，而要去鬧這些糾紛，真是豈有些理！立即停止你們之間的糾紛，重新恢復你們同志的關係，用心去學習，否則黨將不能不採取進一步的辦法的。如果你們有理論上原則上的問題來爭論，或要我來解決，那是很好的，我是很歡迎的。可惜黨校同志對這種問題提出來太少了！

我的講演就就這樣完了。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

——節錄某某會議記錄——

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最近幾年來，是加速地進行着。對馬列主義的精通與對革命運動規律性的把握，是有極大的提高。特別黨中央的正統而堅強的領導，是超過黨的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超過除開黨共黨以外的任何一國的共產黨。由於黨和布爾什維克化與中央正統而堅強的領導，所以使黨在革命鬥爭中也獲得了歷史上空前的勝利與成功。然而，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各方面，在各個地方，各個組織中，並不是平衡的。而且由於統一戰線的環境，黨在各方面上的勝利，大都非無產階級成份的加入黨，使得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也未發展着。必須予這些傾向以毫不讓步的打擊，然後才能更加鞏固黨，並推動我黨向更高的布爾什維克化的程度前進。必須在黨內開展各種不良傾向的鬥爭，反對喪失黨的立場，離開黨的原則的鬥爭，反對不服從黨的組織，不服從中央與上級的指示，違反黨的紀律的鬥爭，反對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鬥爭。必須在黨內發展自我批評，開展這些鬥爭，嚴肅黨的組織與紀律，然後才能在黨性上具體的教育我們的幹部和黨員。這些不良傾向，現在我提出以下幾種來加以說明：

第一種，是在統一戰線的環境與工作中，喪失自己立場與獨立性的傾向，以及在統一戰線中的左傾錯誤。

統一戰線也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在今天中國的統一戰線，是抗日

對民族的統一戰綫。在統一戰綫中的各階層，對於統一戰綫都各有各的政策。所以只有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而沒有超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抗日的各種階層，爲了對付共同的敵人，一方面集合在一起，建立一條統一的對付共同敵人的戰綫（所以有各階級共同的聯合戰綫）；另一方面，各階層又各有各的獨立的政策，在統一戰綫中和其他階層的政策對立着與鬥爭着。看那一個階級站在當時當地統一戰綫的實際領導地位，統一戰綫主要就實行他的政策去對付共同的敵人。其他階級的政策，是不能實行或不能完全實行的。比如，今天在敵後主要是實行我們的政策去對付敵人，是因為我們在全國的統一戰綫中，還沒有實際領導地位。而在全國，則不能實行我們的政策，也是因爲我們在全國的統一戰綫中，還沒有實際領導地位。所以我們的統一戰綫政策，是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獨立的政策。它沒有超越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與黨派性，它與目前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階級對統一戰綫的政策，均有其不同點。它代表無產階級最高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中國全民解放的利益（這是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之特殊條件而發生的），其他階級都沒有這種條件。所以我們的統一戰綫政策，就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統一戰綫教育，就是階級教育，就是教育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在革命中如何去與其階級進行統一戰綫。

只有提高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階級覺悟，只有劃清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界限，才能使無產階級與農民正確地真正地去與資產階級和地主進行抗日的統一戰綫，才能保持自己的立場與獨立性，否則是不可能的。

但是黨內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負責同志，是不了解這一對立的。他們把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和階級政策對抗起來，把黨的統一戰綫教育，和階級教育對抗起來。把黨內統一戰綫政策，看作是超階級超黨派的東西，把黨的統一戰綫教育，看作是超黨派的的教育。因此，他們就不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堅定的立場，去和其他黨派階級進行統一戰綫，去教育羣衆與教育黨員；他們站在一個

超階級超黨派的立場上，去和其他黨派階級進行統一戰綫與教育羣衆和黨員。因此，就必然要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作其他階級的俘虜，必然引導黨與羣衆去作其他階級的尾巴。在黨內和羣衆中散佈其他階級的影響。

除開階級政策外，是沒有超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的。只有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家和自欺欺人的剝削者，才會假借一個超階級統一戰綫政策。

他們認爲黨的統一戰綫政策與階級政策是不相容的，如他們的公式就是這樣：要末是統一戰綫政策，階級政策與階級教育不要了（這就要成爲階級的叛徒）；要末是階級政策，統一戰綫政策就不要了（這就要成爲左傾的統一戰綫的破壞者）。所以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同時也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本質。

有些同志以爲：在抗日與統一戰綫時期，無產階級與農民不得不相當限制自己的階級鬥爭（如停止土地革命與暴動政策等），不得不在抗日這問題上與其他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合作，如他們就認爲要提倡勞資合作、階級調和的理論了，要停止或取消工農的階級鬥爭了，工農的階級覺悟不應該提高，不應該在工農的思想、組織上明確的劃分勞資界限及農民與地主的界限；相反，應該使工農的階級覺悟降低，階級界限模糊起來才好。他們把我黨目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很庸俗的看作是一樣的、同格的。因此，他們在統一戰綫中就喪失自己的獨立與黨派性，在黨內和羣衆中公開發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的理論。他們認爲統一戰綫政策與階級鬥爭是不相容的。如他們的公式是：或者統一戰綫，階級鬥爭便應當取消、停止；或者階級鬥爭，統一戰綫便應當取消、拋棄。如他們在一個時候表現爲左傾機會主義；在另外的時候又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他們不懂得統一的統一戰綫政策離開不了階級鬥爭，黨爲統一戰綫所進行的一切鬥爭，都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綫本身就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表現。

形態。在統一戰綫中一方面要統一，另一方面是鬥爭。離開鬥爭就沒有真正的統一戰綫，就沒有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獨立地位。但在統一戰綫時期，黨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主要是爲了發展、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綫；而不是破壞拋棄統一戰綫。因此，黨在進行階級鬥爭的時候，就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對於各種不同的階級，停止土地革命與暴動，有理、有利、有節就是這種程度之一。所以在統一戰綫時期，適當的發展工農階級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提高工農階級覺悟，在觀念上組織上對消工農與資本家地主的階級界限，是完全必要的。沒有這些，黨就不能準備無產階級和農民去與其他階級進行新一戰綫。但是，鬥爭是爲了統一戰綫，是以鬥爭來團結，統一戰綫也離不了鬥爭。

我國的同志，常常是不注意去進行統一戰綫工作，輕視這種工作，不了解這種工作的充分進行，及統一戰綫的開展，對於我們的勝利及工作開展是具有極大關係的。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同志，是不善於去進行統一戰綫工作的。這些，都是同志中極大的缺點，須知我們如果沒有很好統一戰綫工作，建設很好的革命統一戰綫，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某些同志的關門主義作風——只歡喜自己的一套，不與外界接觸，不懸掛國旗與孫中山的像片等等，是一種最壞的妨害黨與無產階級利益的作風。這些都不表示他們爲覺悟的中國無產者的特性，而表示他們的小資產階級關門主義的特性。但是我們另外一些同志，就在統一戰綫工作中明知要決自己獨立場與黨性。他們與異己的各階級的大相接觸，在思想上、生活上，就接受異己階級的影響，就完全相信這些人的言論，就放棄自己的警惕性，並且把這些影響傳達到黨內與勞動羣衆中來。他們或著有資產階級自己的立場，接受異己者的收買與賄賂，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和異己份子打成一片。他們覺得自己與對階級的人在一起，是更接近更痛快。因而而和工農勞動者——他們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對黨內組織上記律正的確切特性，不獨不能自覺的遵守與擁護，而且

認爲簡直是可怕的，用一切辦法來逃避。這種人，雖然或者還保留了他們的黨籍，但共產黨員的党性，是完全沒有了的，他們資本主義化了。如舉不痛加改正，他們的黨籍遲早是保留不了的。

由於地主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革命性與搖動性，我們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在抗日時期就不但不採取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政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即聯合其革命的抗戰的方面，而反對其動搖的妥協的反動的方面。這種政策在執行的時期，又依照各種不同的空間和時間，依照各種不同的具體的對象，有時我們強調聯合，有時我們又強調鬥爭。但在整個抗戰的時期，即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期，一般的我們是強調聯合的，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爲了更廣大的在更長的時間和更高的程度上聯合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繼續抗日。但是黨的這種政策，許多同志是沒有完全了解的。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對地主資本家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如何去執行？他們在實踐上，在聯合的時候，就只知道聯合，而不知道鬥爭；在鬥爭的時候，就只知道鬥爭，而不知道聯合。或者他們聯合的不恰當，鬥爭得也不恰當，他們始終未能根據具體的情況與對象來正確執行黨的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的政策。

……現在我們要在黨內來討論一下——對於某些階級和黨派如何來執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

……但是，目前在我們的實際工作和實際政策中的錯誤，來得最嚴重的，還是「左」傾的錯誤。在各根據地中，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無例外的或多或少都犯了「左」傾的錯誤。

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具體去區別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中的各派與各種不同的階層。不知道那些人應當算作漢奸？那些人應當算作投降派？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算作頑固派？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算作中間派或中間份子與中間勢力？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算作進步份子與進步勢力等等，他們甚至把所有的地主資本家統統的看作是投降派或頑固派；而他們對於投降派與頑固

派又只實行鬥爭，不實行聯合。所以他們在實際工作及實際政策中就必然要冒犯嚴重的錯誤。

……我們可以說：目前還在我們根據地中的地主資本家，除開極少數以外，他們在政治上最沒有一定的成見的，他們並不是一貫的頑固的反共份子，他們也沒有加入一定的政治派別（雖然他們與各方面有密切聯系的）。對於他們，只要我們能够遇事向其很好的解釋，不露份去侵犯他們的利益，不失信犯他們的安全，在政治上給他們以自由及參政的權利，不去傷害他們的面子，他們是不一定會反對我們的。他們是可以對我守善意中立或在一定程度上贊助我們的（雖然這是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來說，他們中之大多數是中間份子，是我們必須要聯合與爭取的。如果把他們籠統的看作都是反對我們的，都是頑固派與投降派，那在實際工作與實際政策上就必然要冒犯嚴重的錯誤。

……爭取中間勢力，爭取中間份子，使之站在抗日的一方面，站在我們的一方面，或對我守善意的中立，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中間勢力與中間份子的背向，對於我們所進行的革命，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爲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中間勢力佔着極大的比重。中間勢力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可能勝利。相反，就不能勝利。這個問題在目前對於我們，還有其更加重要的意義，就是大資產階級也正在用一切方法爭取中間勢力。所以在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上，這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看誰的力氣強大？誰能更多的適合中間份子的要求給中間份子以更多的權利？誰能更少的侵犯中間份子的權利與保障他們的權利？誰就能够爭取中間份子站在自己一方面。

至於中間份子的動搖性，那是中間份子的特點。在政治上不動搖的人，就不能成其爲中間份子。所以我們也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來穩定與停止中間份子的動搖；但我們不能因爲中間份子還有某些動搖，某些不可靠，在某種時候（特別當着我们的政策錯誤侵犯他們利益的時候）遠

有反對我們的可能，就不去爭取他們，或給他們以打擊，或把他們當作反動份子來懲辦。這是不對的。對於中間份子我們要實行堅定的謹慎的政策去爭取他們。不可以因為一點小事，因為他們在某種動搖與某些不滿的表示，因為貪圖小利等等，而放棄與違背我們爭取他們的政策。

許多同志似乎總有這樣一種成見：認為在我們根據地中普遍的地主資本家是天生反對我們的，我們和他們總是會弄不好的。因此，他們在實際上就不相信，在抗日的時期我們能夠爭取普通的地主資本家和我們站在一起來抗日，建立政治上某種同盟來實現民主。他們忽視在抗戰以後地主資本家的政治態度比抗戰以前有了一般的變動，他們還是用內戰時期的眼光來看今天的地主資本家。他們片面的誇大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而忽視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在抗戰時期關於民族獨立和民權自由的共同要求。所以他們就不能忠實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一切可能抗日的各階層的人民來繼續抗日。他們常常只是站在一種暫時利用的觀點上來和一切人們進行聯絡，但一有某種變動，便對昨天的朋友「不容氣」，給以種種壘壘。這當然是不對的，違反黨的政策。

不錯！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一般是存在着基本矛盾的。誰看不見這一事實，誰就不能成其為共產黨員。但在今天來說，中國的具體情況，地主資本家就不只是和我們之間存在着基本矛盾；他們和日寇僞軍之間也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頑固派之間又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對這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他們今天的政治態度，大多數就依照他們這三方面矛盾的情形來決定。看他們對誰一方面矛盾更大，更危害他們的生存，他們就與誰弄不好，就會要反對誰。一般來講，在敵後的地主資本家，他們與敵人僞軍之間的矛盾，是更大的，他們與頑固派之間也有極大的矛盾，如果我們能正確實行中央的統戰政策，那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矛盾，這比較小一些，而我們中央的統戰政策，如三三制，稅收政策，辦好政策，土地農民政策，勞

動政策等，都一般的照顧到地主資本家的利益，都嚴禁過份侵犯他們與加重對他們的負擔，都對他們有很大的讓步。目的就是爲了縮小一些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在政治上和他們更進一步的建立一致。因此，只要各地能正確的切實的執行中央的政策，在敵後根據地中一般的爭取地主資本家站在我們方面，是完全可能的。我們應該完全相信這一點。只要是在政治上沒有一定成見的地主資本家，我們是能和他們弄得好的。因爲敵人僞軍及頑固派和他們中之大多數弄不好。

當然在敵後根據地中我們對中間階層的讓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限度就是：要不防礙我們在敵後長期堅持抗戰，保持我們的獨立性與領導地位，最低限度的改善勞苦羣衆生活狀況的要求，超過這些限度的讓步，是錯誤的，是右傾。但是在中央已經決定了讓步的，已經規定與宣佈了的各種政策，必須爽快的完全的執行。……

現在我們最大的缺點，就是各地不能完全正確的執行的中央的政策。一方面我們許多同志還缺乏對於中央政策的真正了解；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將中央的政策在各地不同的情況下具體運用，所以常常發生錯誤。因此，某些中間人士對我們就有這種批評說：「只要你們的黨員真正能聽你們黨的話，那你們治天下完全無問題」。意思就是說：現在你們的黨員並不能真正聽黨的話。你們上面所答應的，在政策上所宣佈的，你們並不能真正照着去作。你們所宣佈的政策，與你們的實際行動之間不一致。你們的下面與上面不一致。還有你們的軍隊與政府又不一致。這個軍隊與那個軍隊也不一致。……

某個士紳和我們談話之後，最後向我們說一個「信」字，意思就是批評我們有點「無信」。批評我們說得好，宣佈的政策好，上面講得好，但作得並不好。說我們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作。他們對有點「今爲座上客，明爲階下囚」之感。他們說我們「轉瞬無情」。說我們今天這個人和他們交朋友很好，明天我們那個人又去對他們不客氣。……

同志們！這些是從中間份子那裏來的對我們的致命的批評。……

在這裏不只是表現我們各個組織之間的關係不好，而且是表現我們在黨性上的極大的弱點。表現我們在政治行為上的全黨的統一性與集中性完全不夠。表現我們的散漫、輕率、不一致、不團結。這與中央在關於黨性決定上強調全黨統一性集中性的指示完全不相符合。這種現象如果不完全改正，那就要使我們不能去進行統一戰線，不能爭取中間勢力，不能戰勝我們的敵人。所以這種現象的發生，是不能允許的。

……這種現象的存在，必然要給敵探奸細及反動份子利用來反對我黨，破壞我黨，並給他們在我黨內部進行挑撥離間的各種機會。

我們必須遵照中央的指示完全克服這種現象。必須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必須在實際上作到這一點。必須做到我們內部的完全一致。做到上下的完全一致，軍政的完全一致，實際的行政與宣佈的政策完全一致。全黨與中央完全一致。只要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我們就增加無限的力量。

第二種、是在黨內一部份同志中發展着的個人享樂主義的傾向。

個人享樂主義，在中國封建階級中是一種普遍的腐化的人生觀。他們認為：人生在世界最高貴的就是能享受到個人的快樂。否則是不值得活的。中國的舊文學中反映不少這種人生觀。中國目前社會上這種人生觀也很普遍。在我們的一些黨員中，也傳染了，並且發展着這種個人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黨員（俗稱人都一樣）只要一碰上這種人生觀，就要喪失黨員就可寶貴的品質——前進心，責任心，創造心，而變為落後的、沒有出息的、腐化的廢物，變為黨的一種羈絆的負擔，甚至變為危險的人物。在最初的時候，或者他們就覺得：在社會上憑他自己個人的努力

，是享不到什麼快樂的，而要加入到黨與革命的隊伍中來，或者採取投機的偷竊的行為，掠到什麼東西，就快樂一下；或者在黨與隊伍內盡一番努力，立下一點功勞，然後以功臣自居，向黨提出要求。某些人在最初加入的時候，或者是爲了革命，但到現在就變了，他們似乎要這樣說：給我一切應有的享受吧！因爲我是經過了艱苦鬥爭的幹話，有功於黨，我的責任已經盡了（？），我今天已經對黨沒有什麼責任了（？）。黨欠了我的債（？），我今天對黨就只有提出要求，給我報酬吧！如是一大堆的私人要求提出來了，吃飯、穿衣、睡覺、走路，再加上補藥針……都要黨來給以滿足。一切的風頭，黨內一切的影響，他都要享受，黨內一切的東西，他都要佔有權拿來個人享受……地位必須比別人——至少要比那些黨齡較短、有能力、負責任、進步的黨員——要真些，權力必須比別人要大些，享受必須比別人要好些，但是工作與責任，學習與進步，黨與無階級戰鬥的利益，他却是不大關心的，或者是忘記了。如果你說起來，他也還會記起來，會向你說一大套關於黨與革命利益的空話，並可再三向你申明：不要誤會他，他是要求黨要滿足，工作還是沒有心思去管。他在黨內的工作與功勞是有限的，但他的要求與希望卻是無限制的。因爲他在黨內管於專門作一種關於資格上享受上的比較，而同志中工作上的比較他特別特行。水漲船高，他的黨齡總是一年提高的，他的要求也就可以一步步提高。他可以同你說：某某人以前是在我下面作什麼的，我作什麼的時候，他還在作什麼，而他現在（因爲工作的努力與成績）又作什麼了，他已有什麼什麼了……他覺得：他總要比後來的同志不論在那方面（離開工作以外），都要高出一等兩等才行，才算公平，否則，他就認爲「不公平」，他更可利用黨愛護幹部的指示來提高要求，但當他去管理幹部的時候，他又把黨愛護幹部的指示忘記了。他可以向幹部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他把這些什麼什麼東西看得比共產主義全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還重要得多，他對這些什麼什麼感到無限的興趣，因此，他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他對於黨也感

爲一種負擔。如果你不能滿足他，他可不滿意，他的牢騷可多很多，他可不負責任的在一些角落裏去進行對黨不滿的廣播。如果這樣還不能滿足，他又不學習與進步，如是他就可能另想以下三條出路：或者在有機會的時候發發洋財，在工作中進行某種非法行爲，去滿足自己的享受；或者捲款潛逃，投敵；再或者，就沒有出路的自殺。這三條路，是這種傾向發展下去的最後結果，危險的結果。

這種着識表現他爲封建階級享樂主義影響下的農民落後意識的特性。這民前進的共產黨員的黨性，是不相容的。

這種人，因爲他脫離空氣，脫離階級太久，反映不到羣衆中的前進的革命情緒，因爲他被革命的艱苦鬥爭所嚇住，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及共產主義事業中的艱苦性，他深受舊社會腐化生活的影響，他已經或正在開始蜕化爲社會上的游離份子，而日益離開黨與無產階級，思想上、行動上、甚至生活上，已經喪失不是一個前進的共產黨員，但由於他的歷史關係組織上還留在黨內。對於這種人，必須給以嚴格的批評，揭發與教育，使他警覺起來，進步、學習與工作，才能挽救他的沒落。

對於這一類的黨員，黨應該採用如下的辦法：（一）記錄他們以前的工作與艱苦鬥爭，不要抹煞，在他們改正錯誤，掩護黨的方針政策負責工作的條件之下，號召黨員對他們要有相當的尊重，並給以相當的待遇；（二）嚴格的批評與揭發他們錯誤的思想、言論、行動，警覺與教育他們，要他們改正過來。努力學習進步，在黨組織指揮之下努力工作，否則給以撤職和處分；（三）如果不能工作，或者殘廢，有病，在他們擁護黨，不在黨內散佈不滿意情緒的條件之下，要他們休養。必要與可能時，可設立休養所；（四）如果不願繼續在黨內工作，要求脫黨並脫離工作時，在備不投敵、不反黨、不洩露黨的機密的條件之下，允許他脫黨。

第三種、是在某些同志特別某些負責同志中存在與發展個人英雄主義傾向。

個人英雄主義與個人權威思想，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還不能完全打滅的。一到某種環境下，特別是勝利與成功的時候，這種思想就在一些同志中發展起來。但這是一種個人主義。因此，他可以發展到完全離開黨與階級並走到反黨反中央的地步。這種思想，對於一些工作能力強、地位高、担負獨立工作、而黨性修養不夠、黨的組織觀念不強、服從命令的精神欠缺的同志，就特別危險。因為他使個人英雄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一切條件，因為他有相當的能力，相當的資格和地位，他就能善於粉飾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如何革命與忠實於黨，他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權位，去造成個人威信，以不正確手段去拉攏幹部，排斥那些不服從他個人的忠實於黨的黨員。這種人的毛病和危險性，在其嚴格錯誤未形成時，不容易為黨內所發覺，積久可能造成尾大不調，並可能使黨遭受最大的損失。

共產主義事業，是空前偉大的，是無數千萬與萬萬人來共同創作的。任何一個人，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多少的努力與成功，都多少種下一定的影響，都多少為共產主義的總倉庫添加資本。百餘年來，由於全世界無產階級不斷的發展，及無數的英勇鬥爭，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理論上實際上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空前偉大的貢獻，由於蘇聯無產階級的勝利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由於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在世界上的數十年的努力，再由於中國共產黨二十一年來的英勇鬥爭，數十萬黨員先烈的犧牲流血，及其最近在抗日戰爭與統一戰線中的發展，由於這一切，就造成了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在世界上的空前偉大的地位，及其在勞動人民與進步人士中無與倫比的威權。今天共產主義是以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為任何反動勢力所不能阻止不能戰勝。共產主義事業這一筆不可計算的空前偉大的資本，從馬克思以求無數先烈共同的寶貴的遺產，都為我們今天一切男女共產黨員所接受，所繼承。我們今天來參加共產主義的偉大行列，是在

這樣的基礎上，這樣的條件之下，來參加的。當然，我們比以前的共產黨員，是討了很多便宜。我們是在共產主義已有這樣一筆偉大資本和遺產之上，去開始進行我們的工作的，所以在我們的工作與鬥爭中，在多方面就比較更容易的得到勝利與成功；雖然共產主義還要經過很多艱苦鬥爭，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事業，從過去百餘年來在歷史中的成功所給予我們今天在工作上的影響，這一點，是我們許多自高自大、有個人英雄主義的黨員所忽略所不了解的。由於黨在廣大羣衆中有最高的威信，爲廣大羣衆所歡迎與擁護，一部份的反動份子也在黨的這種威力下面懾伏着，而向黨乞憐與投機取巧。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隊伍，就到處得到羣衆的擁護與贊助，大批的先進份子湧到我們隊伍中來，某些反動勢力也不敢抵抗我們。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與我們所要求得的一切，也比較容易成功，勝利與成績比較容易取得，困難與危險也比較容易克服，容易挽救。如是，這就沖昏我們一些黨員的頭腦，他把一切的勝利與成功，都上在他個人的賬上，他認爲取得這些勝利與成功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本事，個人的能力。他自以爲：什麼都行，什麼都能幹，比什麼人的本事都高，什麼都不怕。他自以爲：「了不起的人物」。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並不會比他更高明，黨的中央、中央的各領袖，更不會比他更高明，「他們還不了解我這裏的特點」，「不懂得我這裏的情形」，「中央對我這裏的工作與勝利並沒有什麼幫助」，「這裏的一切，全部是由我幹出來的。我還有什麼不行的呢？」如是，他就可以自作聰明，獨斷一切，武斷一切，一切都拿在自己的統治之下，一切都自我風氣，形成爲獨斷一方的「英雄好漢」，土大王。如是，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與偉大事業，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利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等等，就早已和他的腦袋分了家。他也早已「吾不復夢見國公」矣。共產黨員的黨性，自發就根本說不上了。

如這種可笑的，渺小的，甲虫一樣的「英雄」，在我們黨內是已經產生過了。如過去的張國壽、高樓亭等。在以後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是還有可能產生的。而每次這種「英雄」的產生，都要給黨以極大的損害。這種「英雄」是沒有不失敗的；因為他忽視黨的偉大影響。他的勝利與成功，是當他還是共產黨員，在黨的偉大影響與直接幫助之下達到的；所以到他一脫離黨，反黨的時候，他就完全是孤立的。最後，他非失敗不可。

關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切工作，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具體的，都是經過各個具體的黨員和革命者去作好的。除此以外，沒有所謂抽象的一般的革命工作。某些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某些作過很多具體革命工作的「功臣」，他們厭惡與輕視這些切實的具體的革命工作，總覺得他們不是作這種「麻煩瑣屑事情」的人，總覺得除開這些具體的但是革命的工作以外，似乎還在某偏僻神秘的地方，存在着「一種神通廣大」，足以使他們揚名後世的，抽象的，一般的，並不麻煩的什麼革命工作。他們要求黨分配這樣一件神秘的工作給他們去作，那他們就會趁心如意的，就會馬到成功的。然而黨是找不到這樣一件工作分配給他們，他們自己也說不出這樣一件工作來。但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硬以為有這樣一件工作，被什麼人收藏起來不讓大家都知道，他們可以為此煩悶，對黨表示不滿，抱怨黨不栽培他們。其實，他們所理想的這種革命工作，完全是他們主觀上的一種幻想，世界上並不存在這樣一件抽象的革命工作。如果要有的話，那就只是那些「革命的空談」，漂亮話，但是列寧又說過：「漂亮話少說點！細小的日常工作多做點！」可見那些「話」雖「漂亮」，惜乎是不大「革命的」；那些「日常工作」雖「細小」又麻煩，但又偏偏是革命的。不然，列寧又為什麼要我們少說漂亮話，多做細小的日常工作呢？那末，他們又可以問：就不說漂亮話，說老實話如何呢？說老實話，是可以的！但老實話，不是空談，老實話也是具體的。一切革命經驗的抽象，一切科學的抽象都是具體的，都更深刻反映事物的本質。即真理總是

具體的，沒有抽象的一般的真理。馬克思寫資本論，是說老實話。列寧辦報紙，大會作報告，是說老實話，爲黨出主意，定方案，提計劃，也是說老實話。但這些都是具體的，而不是空談。因此，也就是麻煩的，馬克思畢生之力，還沒有把資本論寫完。你如果能够說老實話，那就分配你辦報紙、辦雜誌、教書、大會作報告、定計劃、提方案、出主意……即使不寫資本論，寫什麼「論」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作，作得好，作得對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有利，黨都可以毫不吝嗇的分配你這些工作。如果你這些工作不能作的話，那末最好你還是聽列寧的指示：去多作一點細小的日常工作吧！這比說漂亮話要革命得多！對黨對階級的戰鬥有益得多！而在這些細小日常工作中，也並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來的。蘇聯英雄斯泰哈諾夫，是在採煤炭的細小工作中挖出來的。大科學家瓦特、牛頓，是觀察開水壺、蘋果從樹上落下來的事細小事情中發明的。任何輕視具體切實日常工作的傾向都是不對的。

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經過各個黨員去作好的。我們完全不否認個人在具體工作和鬥爭中的決定的作用，但這一事實在另外一些同志中又發生另外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只看到這一點，誇大這一點，而忽視黨的偉大影響對他們今天工作與戰鬥的作用。他以爲工作是他個人作好的。如就是認爲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力量。勝仗是他打的，地方是他打開的，根據地是他建立的，人馬是他擴大的，糧食是他繳來的，還有錢、糧食、衣服、以及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是他攪來的。如是他就覺得：他的勞功很大。他認爲他有全權支配這些東西，把這些東西作爲他個人所有，似亦不爲過份。如是錢就可以上腰包或者扣留起來，好東西收起來，槍利馬固然要他的了，最後把隊伍也看作他的，幹部也是他的，根據地也看作是他的才好，如果還有其他的黨員在這裏工作——辦報紙、作縣長、區長、收稅……那還要他特別「寬大」哩！因此，誰如果調他的人、槍和馬，要他的東西和錢，他可不滿意，他可認爲你不應該。因爲這些，都是「他的」，或者至少是他

攪來的。他可以向你說：「這個地方是我打開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地方應該歸我，或至少我可以在這個地方橫行一切，支配一切，你，黨，不應該，沒有權力來支配這個地方，這種觀點在我們某些幹部中是存在的。

這種人不了解：他之所以能够勝利，能够攪到錢槍和人馬，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的奮鬥，同時主要的是由於黨的份量，由於黨的偉大影響。倘若在世界上，在中國，沒有共產黨，沒有從馬克思以來百餘年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努力，即使他個人有何等大的本領，他也是不能勝利的，他也是不能攪到錢槍和人馬的。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是工農出身，而今天已作了團長旅長和司令，他們打勝仗，攪來了很多人、馬、錢、槍，這都並不是由於這些工農同志怎樣的了不起。他們原來和普通的工人農民一樣，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受了黨的教育，在黨的指揮幫助之下忠實努力奮鬥，他們倚靠着黨，就格外顯出他們的神通廣大，能够戰勝強敵，而獲得一切的勝利品。原因就在這裏，試問！倘若沒有共產黨，這些工農同志是怎樣呢？最大的可能，還依然只是工人農民，依然和普通工人農民一樣，作工、種地、老死埋葬而已。即或跑出門來，至多也只能弄到自已一家的衣食。說得上什麼團長、旅長、打勝仗……呢？和這些同志一樣的工人農民，世界上真是千千萬萬，也僅僅因為他們沒有加入共產黨，沒有受過黨的教育與在黨的指揮下忠誠奮鬥，他們被舊制度壓制住，所以他們，不能和我們今天這些同志一樣，享受共產主義英雄的榮譽。倘若他們也加入共產黨，並這樣作了，那他們也可能有同樣的發展。所以，一切都是黨的份量，應該一切歸功於黨。一切只有依靠黨，離開黨就沒有一切。任何黨員的勝利（以及人馬錢槍），都是黨的勝利（黨的人馬錢槍）。只有黨的勝利與發展，黨員個人才能勝利與發展。

不依靠共產黨，任何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都是無能為力的。

然而，某些同志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已經受了黨的長期的教育，已經在黨的指導之下幹出了

許多不平常的英雄的事蹟，如果他們繼續在黨領導下忠誠奮鬥，他們的發展前途是無限的。但是共產主義的英雄地不作，而想離開黨的指導，去作個人主義的「英雄」。其愚蠢莫過於此！結果，「英雄」作不成，弄到身敗名裂，走頭無路。叛變了的張國燾、高俊亭如此，某些逃跑份子如此，以後還有任何想作個人英雄的好漢，也只能如此。

因此，爲了黨的利益，也爲了愛護與挽救某些同志自己，黨必須不留情的嚴格批評那些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的黨員，不管他是如何的高級幹部，也不要怕批評了會引起他的什麼不滿與喪失他的什麼「威信」，方式雖應講究，誠懇坦白和正面的說服，但是必須批評，令其改正。必須嚴肅黨的軍隊的紀律，不能容許有不服從黨的領導與上級指揮的事情發生。決議與命令，必須堅決執行，不能容許推諉玩忽！部隊是黨的，中央的，不是任何個人的。幹部是黨的幹部，中央的幹部，不是任何個人的幹部。人槍馬匹以及一切東西都是黨的，不是任何個人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一切都由黨，黨中央，以及中央所委任的高級指導機關統一支配，不許扣留、隱藏和竊取。只會如此，才能嚴厲挽救我軍陣容，才能阻止個人英雄主義的發展，才能挽救某些害了「英雄」病的黨員。

第四種、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本位主義傾向。

共產主義事業，是一種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事業。無產階級的解放，須要全世界的統一執行與鬥爭。從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已開始了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的統一的戰略新階段。因此，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戰略，都不是離開其他各國孤立的前應服從統一的戰略新階段。這種情形，就要求世界所有的共產黨員，需有何等遠大眼光，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就是說，要求我們老同志在決定自己行動方針的時候，不只是要根據自己所負責的一部份工作的利益，也不只是要根據全黨範圍內整個工作的利益，而且要根據全世界範圍內整個無產階級的戰鬥利益與戰略要求。

不是全國全世界的革命的利益，來服從我這一小部份工作的利益，而是要我這部份工作的利益去服從全國全世界的革命的要求；因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是全世界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國家一個部份的事情。

馬克思指示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決定自己一切行動的時候，要根據下列的原則：即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一國的利益服從世界的利益。一切共產黨員，必須深刻記取這個原則，並做爲自己一切行動的方針。任何違背這個原則的行動和言論，都是錯誤的，都要損害無產階級的整個戰鬥的利益。尤其在今天，在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正要求無產階級有統一的行動，才能戰勝法西斯和反動派，這個原則就特別重要，特別要求在組織上、紀律上、保證一切共產黨員遵循這個原則來行動，而共產黨員的黨性，也特別表現在對這個原則的完全執行上。

在我們同志中存在着的本位主義，就根本是與上述的這個原則相反的東西。本位主義的原則：不是部份服從全體，而是要全體服從部份；不是目前服從將來，而是只管目前就不管將來，只管今天就不管明天。一切從他本位的利益出發，只管他自己，只要他自己一部份好就算了，就不管人家，就不管大局。不照顧大局，不識大體，妨害大局；妨害人家，來遷就他自己一小部份工作的利益。這種狹小淺近的觀點，就是本位主義的實質。這種本位主義，在我們同志中，特別在部隊相當負責的某些同志中是存在的。這種錯誤，在過去已給我們工作的損失很多，如不改正，如讓其繼續存在與發展，在今後將更要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利益以極大的損害。

同志們應該知道：一切事情，如果大家弄不好，整個弄不好，你自己一部份也是無法弄好的，即使弄好了，最後也是不能勝利的。如果大家弄好了，整個弄好了，跟使你的那一部份暫時吃點虧受點損失（只要與全體有利），也是不要緊的，也是可以弄好的。因此，爲了大家，爲了全

體的利益與發展。爲了主要工作部門與主要方面的勝利，有的時候需要減弱甚至犧牲某些部份，也是必要的，正確的。一切共產黨員（有遠見黨性強），在這種時候，應自覺的自動減弱與犧牲某些部份。如果要犧牲我這部份，即應自動犧牲。否則就不對！

共產黨員，應該是識大體照顧大局的，平常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固然要盡責，把自己部門的工作弄好；但同時必須照顧到人家的工作，照顧全體。在與人家發生關係時，應有充分的精神自動協助與配合人家的工作。應有充分的轉神，不使自己的工作弄好，而且也使人家的工作弄好。不是不管、更不是去妨害，而是一番幫助同志的精神，對一切共產黨員是完全必須的。這是一切黨員不可缺少的黨性與道德。

一切有本位主義錯誤的同志，必須立即糾正。在黨內應進行糾正與反對本位主義的鬥爭，因爲這與黨性是完全不相容的東西。

爲了整個的利益，黨與高級機關，對於一切均有統一的方針，計劃與指示。一切就應有統一的支配。一切黨員忠實的服從與執行高級機關的方針、指示與命令，是糾正本位主義錯誤的具體辦法。一切向上級隱瞞或誇大，拒絕或不忠實執行上級指示與命令的行爲，應該完全消滅。這是在加強幹部與黨員的黨性中所必須作到的。

第五種、就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不服從不尊重黨與組織的傾向，以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着與發展着的無原則糾紛與不團結的傾向。

無產階級戰鬥力量的來源，就在於無產階級有很好的組織與紀律。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得最嚴密的一部份，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共產黨員的黨性，不只表現在它有最高的最明確的原則性上，而且表現在他有最高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上。共產黨員不應該有無原則的言論和行動，也不應該有無組織無紀律的言論和行動。黨員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都應該是有原則的，有

組織的，有紀律的。

共產黨不獨是有思想上的一致，原則上的一致，使我們的黨員能夠很好的團結起來，而且還有組織上的一致，紀律上的一致，使我們一切黨員的行動，能夠最高的統一起來。

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體服從中央。這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切黨員都要執行的。

黨的紀律是統一的，不能有需要遵守紀律的普通黨員，與不需要遵守紀律的上層人物之分。

黨的決議，組織的決議，是黨員全體都要執行的，黨的負責人，組織的負責人，首先就要執行。不能說，黨的領導者，負責人，可以不執行決議。

我們黨的組織，不是家長制，不許有任何個人站在黨的一切組織之上來支配黨。相反，而是黨的組織支配任何個人。黨的領導者，組織的領導者，只能在服從黨，服從組織，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來領導黨，領導組織，黨的領袖領導者，都在黨的組織的支配之下，都在多數的支配之下。

共產黨員，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三個以上的黨員在一起，就應該有自己的組織（除開特殊情形外），就應該使自己的行動統一，成爲有組織的行動。

黨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統一體。違反黨的集中原則，是違反紀律的，違反黨的民主原則，也是違反紀律的。黨員，黨的下級組織，對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組織，應更多的注意執行黨的集中原則，注意服從，而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組織，對黨員與下級組織，則應更多的注意執行黨的民主原則，注意多討論，多開會聽與服從多數的意見。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對下面，更民主一些吧！而黨員與下級組織對上面，則更集中一些吧！這樣就使黨員與領導機關，下級與

對黨，達到統一。若反其道而行之，則破壞黨的這種統一破壞。

任何黨員，對於下級組織，對於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黨的上級，如果有政治上工作上原則的不同意見，應向高級黨部報告、提議或控告時，即越級報告、提議與控告時，均是合乎組織手續的，可以的，而黨的領導機關負責人、上級，阻止下面越級報告與控告者，即是違反紀律的，違反民主原則的。不替下面轉達報告與控告達到上級，也是違反紀律的。就是說，必須轉達；只是沒有專路上的不可能。

這些都是黨的重要組織原則，在這裏不詳細說。但是，有些同志，由於思想上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的發展，常常走到在組織上也要發生嚴重的原則錯誤。

服從組織，服從多數，服從上級，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切黨員都要執行紀律，是無例外的。但是有些黨員特別是黨與部隊的某些負責幹部，就偏偏否定這種絕對性，偏偏提出條件，並把自己作為例外。

決議、指示、命令等等，要他認為是對的，他就服從。他認為（還不是真如此）不對，就不服從。他以對與不對，作為服從的條件。但黨的組織原則是：即使不對，甚至是不對，你在組織上行動上也必須服從的。雖然你在原則上仍可保留你自己的意見。

此外，還有人就老看黨的組織負責人如何？如資格老與不老？文化理論水準高與不高？年齡老與不大？地位高與不高？大學畢業或中學畢業等等，來作為他服從組織的條件。他的思想，就盡服從怎樣個個人，而不服從黨組織。……這等大就頭看決議、指示、命令等是否對於他有利，來作為服從的條件。

有少數的負責幹部，他們以為自己是某個組織某個部隊的負責人，他們就以爲：我已經是黨裏人了，對於黨了，不聽黨裏決議與指示，一切人都要遵守；但是，我！我聽該

不同！應該辨別！決議與章程是我黨的，與黨無關的。而且我應該改換態度，取消就取消，我何必還要服從呢？決議與章程是爲那些黨材專制。黨材與老實人就得服從。我是負責人，又是聰明人，而且調皮人，那議會和那些黨材一樣？紀律對黨材才有用。我聰明，調皮而又是負責人，紀律對我有什么關係？我是組織的負責人，組織內的每一個黨員都得服從我，由我支配。我要他們怎樣就得怎樣，那裏我還受組織支配，受大家支配，服從多數與組織呢？這些人就這樣把自己擺在組織之上，作爲黨的組織的支配者而出現，要一切服從他，大家都要遵守他的紀律，可是他不服從一切，一切紀律他都不遵守。他就這樣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改爲家長制，而他作的，是家長。

這種組織上的家長制作風，是由他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支配慾，特權階級的特權思想而來的。這種人如果不給以糾正、鬥爭和打擊，讓他發展下去，他就可能幹出各種罪惡與不法行爲來。

這種人即使他在口頭上宣言如何同意黨的路綫，黨的章程，但是他還是沒有黨性的人。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服從黨尊重組織的絕對性上，表現在對於一切黨員一切黨的組織，對於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對於黨的一切東西的尊重、執行與愛護上。表現在對於黨內一切缺點與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上。沒有同志間的相互的愛、相互幫助，沒有對於黨的一切機關（如地方黨政治機關）應有的尊重，沒有對於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認真研究與執行的精神，沒有對於黨的一切公共事物的愛護如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的精神，沒有對黨內一切缺點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是不能表現他的黨性的。

嚴肅的黨員，即使在極危險、最緊急的時候，他的行動，都是無組織的。如彭湃同志在遭反動派槍殺時，總和他的同志來商量好了大家明的行動，他的行動，到最後一分鐘，還是有組織的。

總的。

共產黨員的階級性，表現在他對革命政策的無條件的補助及親密的關係上，另一方面又表現在他對異己份子及其他階級之政治上組織上的區別之嚴格性上。如果那些人，真是反黨，危害黨與破壞黨的異己份子，和黨站在絕對對立的異己份子，那對他們就應有最高的警惕性，政治上組織上的最高嚴格性，如果不是爲了黨的一定的目的，他不和那些異己份子接近，交朋友，表示同情，更不會和這些份子沒有界限的接近與混同，及洩露黨的祕密。他不讓這些異己份子有機會來進行反黨與破壞黨的活動。他有大無畏的精神在各種方式下和這些份子鬥爭。對其他階級，在政治上組織上亦不和他們混淆，而有明確的界限與區別。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獨表現在對黨外的敵人在堅決頑強的鬥爭性上，而且表現在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各種錯誤的思想、意識與行爲，有不調和的鬥爭性上。共產黨員自己不能損害黨與階級的利益，也不容許任何其他的黨員來損害黨與階級的利益。所以他不論在什麼時候遇着其他黨員有錯誤的傾向與言論行動，他不獨不會無原則的去表示同情，也不會採取自由主義的不理態度，而會站在堅定的原則立場上，採取正確的方式，向這些錯誤傾向與言論行動進行不調和的鬥爭。黨內有充分的自我批評精神及不調和的原則鬥爭精神，是一個黨員不可缺少的特性。雖然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及程度，是要注意其適當的，但是必須有這種批評和鬥爭的勇氣，不懼怕因爲這種批評與鬥爭而引起人家對他個人的不滿與誤會及可能的反擊，即使因爲這種批評與鬥爭而使自己暫時孤立或吃某些苦頭，亦是必要的。因爲正確的原則與真理，必須堅持。

對於真理與原則的堅持性，和對於黨的組織之服從的絕對性，是不可分離的。不能因爲你在某則上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而且應該堅持，就被填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即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組織與多數，不服從上級。……

在我們的一些同志中，常常表現他們對異己分子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嚴格的界限，優越性不強，因爲舊關係而和這些分子作無原則的接近，混在一起，這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對黨外的同情者，對非黨幹部，對勞動羣衆，則常常表現其不能接近，以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待他們和幾個黨員——好朋友生活在一起，有說有笑，不去理會黨外的羣衆。這都是不對的。

在黨內害怕自我批評，害怕思想鬥爭，對各種錯誤傾向與壞現象，採取原則上的調和態度，或採取自由主義的不管態度，亦是在我們同志中嚴重存在着的。因此，必須反對調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才能發展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與壞現象的鬥爭，而給以徹底改正。關於自由主義，毛澤東同志有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去討論執行。

在黨內應該開展反對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鬥爭，但是對於無原則的鬥爭，則不獨不應開展，而且應該堅決反對。

在我們黨的各部門工作中，現在是有各種缺點，有各種錯誤傾向，有各種壞現象，也有各種不好的或不大好的負責的或不負責的人。同志中對於這些缺點、錯誤與不好的人，也都在反對。但是這些反對的人，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立場和目的，須要給以嚴格的劃分。

第一種人，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上，爲了把工作弄好，也爲了糾正某些同志的錯誤的目的，而正式的誠懇的向相當的組織與負責人提出批評建議，來反對一切不良傾向和壞現象。這種人的立場和目的，都是對的。他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而又採取正確的方式與態度。

第二種人，不是站在黨與階級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個人利益上，或幾個人的利益上；不是爲了把工作弄好，也不是爲了幫助同志糾正錯誤，而是爲了把工作弄壞，爲了自己也取得某些不應有的好處，爲了發牢騷與報復，爲了攻擊某個或某幾個同志……這些目的，而利用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某些負責人的弱點的非正式的在黨內以至黨外鼓動起是非來，搗起蛋來，以便達到

他的個人目的與企圖。這種人的立場與目的，都是不對的。這即叫做無原則糾紛。雖然他所反對的錯誤、缺點與某些人，或許都是事實，但他自己是站在不正確的立場，採取不正確的手段，也不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

第三種人，是隱藏在黨內的好細份子，站在反革命的立場，爲了破壞黨反對黨的目的，利用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負責人的某些不是，特別利用黨內鬥爭與無原則糾紛，來擴大黨內糾紛，以便達到他破壞黨的目的。這些好細，特別殺第二種人建立同盟。因此就使第二種人與這第三種人常常混淆不清。

開展黨內反對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鬥爭，必須照第一種人的立場和方法去進行，而不應該照第二種人、相反，應堅決反對與揭破第二種人的立場、企圖和方法，同時肅清黨內的無原則鬥爭，在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鬥爭中，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利用黨內的鬥爭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來發洩他個人的牢騷與企圖報復。

在黨內存在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以及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是黨內各種無原則鬥爭的來源。這種無原則鬥爭，對黨，對工作，對同志間的相互關係，有極大的破壞與妨害作用。因爲他不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利益的原則上，又不是站在工作與同志間相互幫助的原則上，所以他就無原則，他又不是從原則上，而是從個人的感情與利益上去拉攏一些個人，又去反對另外一些人，和這個鬥爭，又和那個鬥爭，反對這件事，又反對那件事，說這樣，又說那樣……一切都不是爲了黨與工作，不是爲了一定的原則要求黨採取，而是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企圖。所以這就無原則，既無原則，就無標準判斷是非，如果你和無原則糾紛的人去判斷糾紛本身的是非，那就上了大當。因有他是無是非可判斷的。無是非，就不應鬧，不應鬧而要鬧，就該給以無情的責斥與打擊，就要禁止鬧。黨內不許鬧無原則糾紛！一切問題，要從原則

上正式提出來討論。

現在我們黨內，從原則上正式提出問題來討論與鬥爭的並不多，許多同志對這種表現並不勇敢；而無立場、無原則的左背後，在暗地裏去鼓噪的人，倒是很多。這是完全不好的不健全的現象。這是表示許多人的黨性不夠強。因為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他有高度而明確的原則性上。

黨內的堅強團結，是戰勝一切的基本條件。在目前任何破壞黨內團結的行爲，都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而無原則鬥爭是破壞黨內團結的，最能給奸細份子利用的。一般黨員必須警惕，爲肅清黨內無原則糾紛而鬥爭！並提高同志間的原則性。黨內團結，是原則的團結，是有鋼骨鐵骨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如果有人以私人感情、老同學、好朋友、同鄉、同輩、吃酒、送錢、送東西等辦法，去團結幹部，拉攏幹部，那就是完全錯誤的。一切有黨性的黨員，必須給這種人這種行爲以嚴正拒絕，保證我黨及黨的各個機關在黨中央領導下在堅固的團結起來。在正確的，高度的，明確的原則之上團結起來。

以上就是目前黨內主要的幾種不正確的傾向，是必須在加強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中，來堅決反對的。

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

這篇文章是根據劉少奇同志在華中黨校的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但過未經劉少奇同志審閱過，文中如有與講演原意不符或錯誤之處，由整理者負責。

我們現在的革命叫民主革命，政府叫抗日民主政府，根據地叫抗日民主根據地，幹事情都要講個民主；但是民主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民主？「民主」這個名詞在外國話中叫做「德謨克拉西」。我們看到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即兩個資產階級革命的宣言中，一開始就說人是上帝創造的，是生而平等的，接着說國家是屬於人民的，由人民統治，由人民享受，也就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即是說，人民都有最基本的權利，如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居住、遷移等等的自由權利；人民對國家的權利、義務是平等的。這是當資產階級革命時所提倡的民主內容。

同志們知道，民主有幾種，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不僅在形式上不相同，而且在實質、內容上也不相同的。資產階級民主有資產階級的內容與形式，無產階級民主有無產階級的內容與形式。

資產階級在許多地方講平等與人民的權利；但是却可以容許絕對不平等的經濟地位。資產階級有幾千萬幾萬萬的財產，而無數千萬的人無衣無食是不管的。國家社會是建築在經濟結構上的，物質財富的生產方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社會的基礎。人們在經濟上平等，於是形成其它一切方面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虛偽的，實際上僅僅保障了資產階級創制工人的自由和權利。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際內容。

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完全不同，不僅要求法律上、政治權利義務上的平等，而且——這是最要緊的——要求經濟上的平等，要求資本的取消，私有財產的消滅。俄國十月革命時有一條法律：「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法律把經濟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大家都要做工，不做工的就沒有飯吃，不管你有多少錢。有了經濟上的平等，於是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它各方面都有了平等。

資產階級除了允許經濟上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也有限制的（現在的密西斯蒂則根本不要民主），特別有民族種族的平等，如美國講平等但對黑人就不平等。此外還有宗教、男女的限制等等，而無產階級的民主則打破了這一切的限制。只有無產階級民主，才是徹底的民主主義，這是內容上的不相同。

除了內容上的不相同以外，形式上也不相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形式，是議會制度。無產階級國家組織的形式是蘇維埃。議會制度的民主，一面講民主，一面欺騙人民。只有無產階級民主，才真能吸納廣大勞動羣衆，來參加國家管理，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爲鎮壓反革命，宣佈無產階級專政，規定對舊階級沒有民主權利。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也無不平等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工人二萬五千人中選一人，農民二十五萬人中才選一人。這是爲了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但是，到階級消滅以後，選舉權就沒有限制了。這時人民除了有自

論、傳佈、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權利以外，而且還有工作權、休息權、教育權。這只有打破了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後，才可能的。

現在來講民主精神的問題。

民主精神是什麼？這就是人類完全平等精神不發達階級不能實行人類的完全平等。他們口裏說民主，實際上不能實行民主。只有共產主義者，才能實行真正的平等。我們革命者，更在完全平等的精神，即權利上義務上的平等。而且，應該這樣來了，解讀完全平等精神，就是一個人沒有權利壓迫或剝削另一個人，沒有權利去侮辱另一個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剝削你的勞動，而你不能來叫我做事，這就是不平等，也是沒有民主精神。

但是，人有各種各樣的人，到底自然本質是不相同的。有聰明的與愚蠢的，有長得高大的與矮小的，有力氣大的與力氣小的，有男人與女人，這些大的不相似處自然界來的，各有各人的特殊條件與特殊的環境。這是先天造成的不相同。而且因為人們社會環境不相同，如有些人讀書，有些人不讀書，於是社會上有分工，有職務事業的不相同，職權的不相同。如我們軍隊中有指揮員，或戰鬥員；有高級指揮，低級指揮；他們在職務與職權上是不相同的。指揮員要指揮，戰鬥員要聽指揮。黨內有負責人與非負責人，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不管有先天的不同，有工作職務上的職權上的不相同，在根本上是平等的。大權上沒有什麼不平等，總司令沒有權利去打人罵人，或剝削另一個人，要不然就是違反了民主精神。對外國人也一樣，相對待君子，對奴才如果我可以去打他，叫他去做事，這就是沒有民主精神。在中國，好像是男人高一級，女人低一等，男人可以打女人，女人不可以打男人。當然，我也不贊成女人去打男人。但社會上似乎認爲男人打女人似乎是應該的，這就是沒有民主精神。又如我們在工作中，需要一個勤勞員來幫助做這些事，但是如果以爲勤勞員是低我一等，那就是沒有民主精神。勤勞員除了幫助我做

一些工作，除了職務上的不相同以外，他並沒有喪失他的權利、職務與人格。我想，我們應當這樣來理解民主精神。

我們來看一看列寧、斯大林是怎樣講民主精神的。有一次，斯大林出席一個集體農莊突擊隊員大會，他先沒有講話。大家要他講，斯大林就發言說：「大家講話，講得很中肯，很正確，我沒有什麼需要講的，但大家要我講，我只好服從，橫豎權利是屬於大家的。」（有點的這句話，是劉少奇同志特別強調的——編者）這就叫做民主精神，斯大林並不以為自己做的領袖，要講就講，要不講就不講。有一次，一個意大利的歷史學者去見斯大林，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蘇聯對美國人精神提得很高，為什麼？」斯大林答：「我們不是佩服美國人，倒是佩服德國人（那時希特勒還沒有上台）。但我們倒也很佩服美國人的民主精神，在美國工廠裏，很難區別工程師與工人的分別。」在美國，即是他是工程師，錢多，本領大一些，但，並不以為比工人高一等。

在八路軍與新四軍，也是這種民主精神，要分出官長與士兵是並不容易的，這是很好的精神，將來還要發展的。在我們部隊中，這種民主精神基本上一樣，但在某些地方有些不相同了。統一戰綫把幹部統大了一些，在我們有些幹部與同志中，不但不去發揚與保持這種民主傳統，而且故意要表示自己與人家不同。我們要去掉把自己爬得高高的，爬在人的頭上的等階思想。這是反民主的，要不得的。等級思想及級階制度是封建社會的東西。希特勒就是這樣的，說德國人和世界上人都不相同，是特別聰明的人。民主精神在我們幹部中間，有許多人不太够的，真的以為人家要比他低一等，他自己比別人高一等的。想不到職務、職權的不同是臨時的。今天要你做總司令就有職權上的不同，明天不做了，就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美國大總統華盛頓、林肯退職時，就退為平民。美國的資產階級還能够這樣的講民主，但在我們黨員中，却還有要他退為平民退為普通人民就不滿意的。知識份子中也有這種現象，例如做了大學生，就認為要比中學生高一等

。在我們同志中並不是個個都能够真正深刻瞭解民主，具備民主精神。能懂得民主，而且真正在工作中，以民主精神對待勞的同志，旁的黨員的並不多。我們幹民主革命要站在人家頭上，那就不是革命的勝利，而是帶出大批的官僚來了。因此，幹民主革命，首先應該自己就具備民主精神。我們要在政治上、組織上實行民主，提高黨員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這是我們幹民主革命必要的。

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義。現在我們同志中，一方面表現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現有些平均主義的要求。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一樣，有高大與矮小，聰明與不聰明，老人與小孩，男人和女人……等等。人們沒有了這些特殊性，就不可能被認識。同時各人的職務、職權並不相同，於是工作待遇也不相同。例如我們規定當團營旅長的有馬騎，其他的人沒有；有些人吃得稍爲好一些，其他的人就差一些。同時我們同志中，還有極端民主的現象，否認組織性，否認我們隊伍中有指揮者與被指揮者，否認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這種平均主義與極端民主的要求，並沒有平等精神與民主精神。今天的人文化程度還不平等等，社會上的分工有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所以我們在工作上與職務上的不同，甚至有待遇上的不同。有些人職務繁，有一個動務員，有馬騎，甚至叫你吃得好一些；因爲你工作多一些，苦一些，必須有這些不同，才能使她平等，要不然，倒是不平等了。平均主義否定職權上、待遇上的差別，主張極端民主，這是不對的。但，並不能因爲有了這些不同，就比人家高一等；那是違反民主精神的。

民主精神的問題很重要。中國是不民主的國家，一般人民沒有經過民主訓練，不懂民主。而我們黨內，也有很多黨員不瞭解民主的。我們比歐美經過民主革命及幾十年民主訓練的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結果弄成一個官僚。所以今天來介紹一些外

國的民主精神，在中國很必要，甚至在我們黨內也必要。我們要以民主主義教育中國羣衆。甚至在黨內也有實行這種教育的必要。

官僚主義是民主主義的反面，沒有民主的精神就有官僚主義。它是等級社會，甚至一切剝削階級社會的一種統治形式。官僚主義是形式主義的一種，特別注重事物的形式，不注重事物的內容與實質，很多事情形式做得很像樣，以便欺騙羣衆，所以剝削階級都很要面子，要不然，官僚就做不到。

官僚主義不僅在剝削階級隊伍中存在，甚至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在共產黨內，在無產階級國家也存在。特別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及其政黨成為統治的、當權的政黨時，官僚主義也嚴重起來。列寧說：「蘇維埃國家是工人國家。……沒有官僚主義的贅瘤。」在共產黨新四軍內也有官僚主義。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官僚主義相當濃厚。我們被壓迫階級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從那裏來的呢？列寧說：「……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的落後，產生了官僚主義。資產階級官僚機關可以打碎它而組織蘇維埃（蘇維埃是革命羣衆直接組織起來的），但，官僚主義不能一下子肅清它。」「因為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不夠的緣故，一個官僚主義者撤了職，會有一個新的官僚產生。」「要提高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才能最後的真正的肅清官僚主義。要整個的時代，要幾十年，才能提高羣衆的文化程度，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即沒有知識份子與農份子的區別），那時才能最後提高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共產國際綱領上說：「職工會成爲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與國家組織的脊骨，因為它從它中間造就建設工作的領導幹部，吸收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參加它工作，並反對官僚主義的贅瘤爲其特殊任務，此種官僚主義贅瘤是由於非無產階級的影響及羣衆文化程度的低下而免發生的。」

中共黨內有官僚主義，因爲黨內非無產階級影響很大，因爲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文化

程度更不够。官僚主義在今天存在，今後更會存在。所以要肅清官僚主義，是幾十年的事情。今天有許多人寫文章寫標語，要肅清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要肅清的，但一下子肅不清。今天提肅清官僚主義的口號是不對的。我們今天把部隊機關肅完了都肅不清官僚主義。斯大林說過：「關於官僚主義問題，現在說的人非常之多，我不必再來多講了，官僚主義份子在我们的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及黨的機關中當然是有。這是不成問題的。與官僚份子作鬥爭是必要的，在國家政權尚未消滅之前，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候，這個任務是時刻提在我們面前的——這也是事實。但是總應當守一點分寸才是，與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份子應奮鬥的，但如果因此而要主張消滅國家機關、解散國家機關、毀壞國家機關，——這就走上了違反列寧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忘記我們的國家機關是蘇維埃的機關，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一種國家機關。」（見列寧主義問題下卷一三八頁）因之今天我們還不能肅清官僚主義，如果說要肅清官僚主義，就把機關都肅光，這是沒有分寸。但，把我們的機關和日寇、汪逆、頑固派的機關比較，那官僚主義要少得多了。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文化程度沒有最後提高，國家政權還存在，極力勞動羣衆體力勞動還沒有消滅之前，官僚主義不能最後消滅。

為什麼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不够，會產生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寄託在羣衆的黑暗、愚昧、落後那種情況上的，以便於剝削階級來統治羣衆，欺騙羣衆。羣衆的文化程度低，就有被欺騙的可能。官僚主義也就有可能存在。如果無產階級勞動羣衆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大學畢業，官僚就不可能存在，你能做這事情，他也能做這事情，會做的人多得很，官僚就做不成。因為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不够，一部份人文化程度較高，有些事情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做，他就發號施令，於是官僚產生了。我從前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工作，會判斷情況，告訴他們怎樣組織，怎樣鬥爭，鬥爭勝利了，大家都鼓掌，以為我幫了他們忙，把功勞放在我一個人

身上。這就是說，羣衆要把你抬起來做官僚，把你當成官僚來擁護你，因為你一走，他們就要糟糕，你的事情別人幹不了。我們懂得了一點民主，那麼羣衆要我們坐在他們頭上，我們就自己走下來。但這要有民主精神的人才能這樣幹。有些人羣衆要他坐在頭上，他就不下來了，於是就成了官僚。最初的官僚就是這樣產生的。當然，你做官僚做得不好，羣衆還是要反對你。但因為羣衆文化程度不夠，幹部也不够，有些事只有某些人能做，一般羣衆不能做；事情忙不了，大家都要請教這某一些人，於是就產生了官僚。馬虎一點就叫粗枝大葉，慢一點就叫遲緩，粗枝大葉和遲緩的都是官僚主義，但工作上輕重緩急的區別是需要的，這不是官僚主義。因此，提高羣衆的文化程度，特別要提高民主精神進行民主教育是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根本辦法，撤職等只是治標的。一切工作制度，組織制度，要實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能够開展。在共產黨員及幹部間要具備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動督責其他人，鬥爭其他人，官僚主義就很難產生。

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

中國共產黨，中國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進步的政黨，從產生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二個週年了。這是偉大的二十二年，在世界上，在中國，無數的偉大事變，是在這二十二年中經過的。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已經進行了三次偉大的革命，三次偉大的革命戰鬥。第一次大革命與北伐戰爭及現在還在進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是與中國國民黨共同進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戰爭，則是在共產黨單獨領導之下進行的。這三次革命戰爭對於俄黨來說是沒有間斷的一直連續進行到現在，許多共產黨員十多年來就一直沒有放下過武器。在這一點上也就說明白：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發展是與武裝鬥爭分離不開的。

我們的黨，在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連續不斷的全國性的革命鬥爭中，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的；它經過了多次的勝利，也經過了多次的挫敗。它是走着非常迂迴曲折的道路，以至於今日。但它還能夠獨立於偉大中華民國的國土上，並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成爲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唯其因爲它是走過了各種迂迴曲折的道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鍛鍊得特別堅強，它也就具有各方面的特別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可以說，它在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經歷了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

命鬥爭的經驗，不論是武裝的與羣衆的，國內的與國際的，公開的與秘密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鬥爭，各種的黨綱辯論，都有豐富的經驗。而特別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在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是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

我們的黨有各方面的極端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很好把它總結起來。以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來很好的總結我們黨在各方面鬥爭經驗，還是今天我們全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因為這些經驗的馬列主義的總結，是團結全黨、教育全黨、提高全黨以至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一環。只要我們的黨員能够真正懂得我們的歷史經驗，那他們就會要增加無限的信心與勇氣，他們就會把自己的工作大力的推向前進，把我們的黨大大的推向前進。他們就能够避免許多在歷史上已經犯過的錯誤，把他們的工作過程與理論過程得縮短許多倍。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實際的效果，如果拋開如此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經驗，如果輕視我們黨二十二年來法偉大歷史事變中的鬥爭經驗，不用心研究這些經驗，不用心向這些經驗學習，而只去學習離開我們較遠的外國革命經驗，那就是輕重倒置，那就要使我們再走許多彎路，再受許多挫折。

二十二年來我們黨的鬥爭經驗是極豐富的，是各方面的一個綜合。現在我們舉一二加以證明。但是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什麼呢？我認爲在各國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麼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這個問題。大家知道，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國也有許多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

讀者，何者又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與假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是在中國革命雲霧中，並在中國共產黨內多年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是有真假之分的，這種真假之分，並不以各人的主觀自命為標準，而是有其客觀標準的。如果我們的黨員不了解這種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客觀標準，而不自覺的盲從在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去進行革命，那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的事。這種經驗應該是我們黨內各種痛苦經驗中最痛苦的一回經驗。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在我們黨內存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的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以至使這些人佔駐了某些組織某種運動的指導地位，甚至在某種時候佔駐了全黨的指導地位，因而把革命運動引上痛苦的困難的道路。這是我們全體黨員必須引為深戒的一個痛苦經驗。

中國共產黨員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以及宣傳組織工作的能力，並不弱於任何一國的共產黨。我們對於各種工作，歷來就是作得很好的。可以幾十萬幾百萬的組織羣衆，可以二萬五千里長征，也可以在敵後那種艱苦與沒有任何援助的條件下組織根據地堅持抗戰六七年……；中國共產黨員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是很可欽佩的。然而我們在過去很長時期內關於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思想上的準備，是很不夠的。在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就是在革命運動的指導上還不免發生錯誤，因而就使運動遭到部份的有時甚至是嚴重的不應有的損失。這一個歷史教訓，我們必須記取，並且必須在今後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只要我們能够保證對於革命運動的指導在各方面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那就等於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指導，那革命就一定逐步的走向勝利。

然而，要怎樣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各方面對於革命運動的指導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呢？這就

須要我們黨員首先是我們的幹部能夠辨別馬列主義和各種馬列主義者的真假，就須要在革命的隊伍中，在黨內，粉碎各種假馬列主義的體系及其派別，就須要很好總結我黨二十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就須要很好的進行學習，提高我們的嗅覺，就須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的環節和部門中去。

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就有真假兩派馬克思主義者。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鬥爭的歷史，那末在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也同樣的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的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這是我們一切黨員必須澈底認識明白的。

還在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就很恰切的描寫過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這對於中國也是很恰切的。現把他的全文引在下面：

「現有的兩派馬克思主義者。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派。可是，這兩派人究竟還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兩派中間，還橫着一條鴻溝，因為，兩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照例只是在口頭上得意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他們不會或者不願意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或者不願意實行馬克思主義，他們總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活潑的革命的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們不拿經驗，不拿實際工作計算來做工作的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做工作的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史上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符——這就是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意於那個常常欺騙他們的「厄運」。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塞維主義（在俄國）

，就是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西里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給了這派人一個很中肯的估計，他說：這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問題的重心，由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移到實行馬克思主義，移到將馬克思主義化為實際。規定適合於環境的方法和手段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因環境發生變更而變更這些方法和手段，這就是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一樣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周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是拿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是拿實際經驗來做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馬克思的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躍的、革命的力。馬克思說：我們不應當僅限於說明世界，而且應當更進一步去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遵守這幾句話的。馬克思的這幾句話，完全和這一派人相符合。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爾塞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人的組織者和領袖，便是列寧。〔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解放社版一九至二二頁〕新大林在這裏說得很清楚，這兩派人雖然都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做工作，都把自己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兩派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一派人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布爾塞維主義與機會主義者，他們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宣揚馬克思主義，而不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會實行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公式教條。他們在工作時，不拿經驗與對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根據，而拿書本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從分析具體實際生活中去求得，而是從書本上，從歷史和相像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裏面去求得，他們言行不符，口講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作的就完全

是非馬克思主義。客觀事實的發展常常是欺騙他們的，他們總是灰心失望，死氣沉沉。

另一派人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刻苦主義者，是頑強難洋者。他們是實行馬克思主義時，將馬克思主義化為實際，他們特別注意規定適合環境的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以及這些方法和手段的變更。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根據的事情裏面去求得，而是由調查研究國情的情況中去求得。在工作時，他們不拿書本上的引證和根據來做根據，而拿實踐的經驗來做根據，並隨時隨地檢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和教訓別人來推動工作前進。這派人言行一致，口講馬克思主義，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僅聰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們經常保證馬克思主義的活躍的、革命的力量的。

這兩種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歷來也就只存在的。前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陳獨秀、彭述之和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就是李立三路線，就是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就是教條主義。這些東西，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孟塞維主義，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後一種真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同志以及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其他許多同志，他們歷年來所堅持、所奮鬥的路線，他們的工作方法，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

我們的同志和幹部必須明白，必須提高警惕性，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着一條孟塞維主義的隱憂及其思想體系的。從陳獨秀、彭述之、李立三以及後來的各種機會主義與教條主義，他們在各個時期的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在組織上他們也不見得有什麼關係，然而他們的實質，他們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貫系統的，他們給予黨的損害，給予中國革命的損害，是十分嚴重的。中國的孟塞維主義，除托陳派有其歐洲托派的衣鉢真傳外，其他形態的孟塞維主義，是並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及俄國孟塞維克的衣鉢真傳的；

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中，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自己生長出來的。所以這些人與歐洲社會民主黨及俄國孟塞維克比較起來，在形式上有許多特點。這就是「國際孟塞維主義」在形式上是以「反孟塞維主義」出現的，是以「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國際路線」等等形式和詞句出現的。他們在這些美麗的形式和革命的詞句掩蓋下，來進行實際的反對列寧主義——即孟塞維克的鬥爭，來宣傳與實行實質上的孟塞維主義。再由於我們許多黨員和幹部的理論水平低下，嗅覺不高，不能在實質上辨別其為孟塞維主義，就常常為他們那些美麗的形式與革命的詞句所蒙蔽。他們就常常能第一時的取得許多黨員和幹部的贊成，而攫取到黨內或某些部份的領導權位。他們還特別發展半封建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宗派主義、個人主義，並與中國社會中的流氓手段相結合，如是在黨內的爲害就特別嚴重，就特別表現其膚淺庸俗，表現其兩極性與兩面性。這就是中國孟塞維主義的主要特點。

中國黨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傳統，但存在着中國的孟塞維主義體系的傳統。

要識別這種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假布爾塞維克，是不能僅僅從他們的詞句，從他們表現的形式，去識別的。他們可以在言語上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有更多的馬列主義，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更革命更艱苦、殷勤與和藹。然而他們最怕實際的考驗，最怕用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因此，必須從他們的實踐中，從他們的工作中，從他傳談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中，從他們工作結果的檢查中，去暴露這種人的真相。因爲他們是口講的馬列主義者，而不是實際行動的馬列主義者，他們的實際行動照例是不受馬列主義原理的嚴格指導的，他們在做工作的時候，總是拿書本子來做根據，拿馬、恩、列、斯的成語，拿付屢決議上的條文來做根據，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論來做根據，而不拿實踐中的經驗和對於實際工作的討論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問題、決定方針的時候，總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調查研究周圍的實

情況出發，而是從書本上的公式出發，從歷史上的類比出發，或者從蘇聯、從西歐各國、從其他什麼相像事情出發。他們在實踐中是唯心論者。因此，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錯誤的，他們是不能最後把工作做好的，他們在實踐中的結果，是必然要與他們起初的願望，最初在口頭上的宣言相違反的，如果你注意到他們的工作方法，用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及其結果時，就要暴露他們的本質。毛澤東同志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對於這種人是有過嚴格批評的。

然而，這種人的危險性，就在於他們那火堆的馬列主義的詞句，布爾塞維克的外衣及其先天的兩面性，他們可以嚇唬及蒙騙許多工農同志及幼稚的青年同志，甚至就是很老練、很有工作經驗、但理論上的識別能力還很差的同志，也常常被他們所欺騙所俘虜，因而他們就可以把黨的事業弄到很危險的地步。

黨的過去的歷史，是充滿着布爾塞維克路線與孟塞維克路線鬥爭的歷史。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着這樣兩條路線和兩種傳統的。一個是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另一個是孟塞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前一個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後一個是以黨內各派機會主義者為代表。這兩條路線，兩個傳統，是經過了長期的激烈的鬥爭，內容是極端豐富的。在這種鬥爭中，黨內的錯誤路線，孟塞維克的路線，雖然也曾經在幾個短的時期內佔了上風，得到過暫時的勝利，但大多數的情形總還是把錯誤路線克服下去。我們的黨雖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錯誤路線，但是思想上的孟塞維克主義的體系，總是沒有徹底被克服過，沒有徹底被清算過，沒有給它以致命的粉碎的打擊。因此，這種思想，這種傳統，總還是在黨內殘存着，到了某種時期某種條件之下，它又發展得激起來，又威脅我們的黨。

現在應該是什麼時候了，應該從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徹底清算黨內的孟塞維克主義的殘餘，應該很好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並把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 and 黨員

只有這樣，才能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才能實現我們黨的隊伍的統一和紀律，才能保證我們革命經常的正確的領導，才能在今後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否則，我們就不能在今後艱苦複雜偉大的時代中，很好實現我們先進的歷史使命。

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黨內的反映，是它的一種高級表現形態，是成了某種體系的，要清除黨內的孟塞維主義的思想及體系，就要在黨內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去清除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要使我們的黨員能够在一切形態上區別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這種工作，我們已經作了，有些地方還正在作。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去年以來所號召的整頓三風的運動。這種整風運動，是黨在二十二年的歷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批評運動。它把我們的黨向布爾塞維克的道路上空前的推進了。我們應該在整風的這種基礎上，進而總結我們二十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在思想體系上徹底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殘餘，把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化提到更高的階段，這就是我們在黨的建設上今天的中心任務。

中國黨的歷史，應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和各派機會主義者鬥爭的歷史。這種歷史，在客觀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構成的。黨內各派機會主義的歷史，決不能成為黨的歷史。黨內孟塞維主義的體系及其傳統，決不能成為黨在思想上的體系及其傳統。黨內歷史，是與這種體系傳統鬥爭並將其克股粉碎的歷史。為了肅清這種傳統的殘餘，給這種傳統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沒有必要替它掩蔽，替它否認。這對於黨是有極無益的。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

但是，我們的黨員和幹部應該更加提高警惕性的，就是年來我們的敵人派遣了他們這一特殊

份子混進到我們黨內來。這些人也是以馬列主義偽裝起來在黨內出現的，他們與前一種假馬列主義者是有區別的，他們是反革命份子，對於這種混入黨內的反革命份子，我們必須把他們清查出來，這就是要在黨內分清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而在黨內黨清子基維主義的殘餘，則是在黨內分清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界限。這兩種界限，都應該分清，但分清的方法和手段應該不同。前一種是用審查幹部和黨員的方法來分清，而後一種則是用整風與總結經驗的方法來分清。

用馬列主義來清算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及其體系，清查內奸，這是我們目前鞏固黨提黨內的兩大工作。這兩大工作的勝利完成，我們就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我們就能以完全鞏固、完全準備好了的姿態，迎接偉大光明時期的到來。

掌握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武器，肅清約部的機會主義的殘餘，我們是不可被戰勝的。

答宋亮同志

宋亮同志：

來信收到，你的意見是對的。

中國黨內在最初的一個時期——陳獨秀時代及其以後——有些黨員看有一種意見，反對黨員對理論作比較深入的研究，甚至在學校中，當許多黨員專門學習理論的時候，亦強調反對「學院式」的研究。指這些比較理論讀書的黨員為「學院派」；而強調在實際鬥爭中鍛鍊。似乎認為只要有實際鬥爭的經驗，而不要高深的理論研究就能滿足，就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似乎認為馬列主義的理論，無須經過相當長期的埋頭深究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這種意見，與當時某些黨員的另一種意見，即輕視實踐，脫離實踐的理論研究，真正的學院式研究對抗着。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一種是過分強調實踐，輕視理論的重要性，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另一種是過分強調理論，輕視實踐的重要性，輕視實踐對理論的基源性與優越性。他們都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正確解決與正確關係。

黨員在黨的學校中學習，從事理論研究的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理論上的深進與把握，而不是學校生活的鍛鍊（雖然這種鍛鍊系統到所學的理论，即從理論研究中去逐漸改造我們黨員的思想意識，亦是很重要的）。這時候，學生應高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這不獨不能因此就再他作學院派，而且是學生的主要工作。當自埋頭讀書研究，這一事實，並不表現為學院派，而是每一個黨員在從事馬列主義研究時所必須如此作的，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馬克思、列寧本人，更是如此。過去有人指埋頭讀書為學院派，

是完全錯誤的。特別在學校中來辯論，就更爲有害。

學院派是歐洲學術界及馬克思主義者中一個派別，是一個專門名詞。這派人只有離開實踐的理論的研究，輕視實踐，而不將理論與實踐聯系，結果，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變成死板的教條，而不能成爲實踐的指導。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反對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及我們黨員中，今天仍然是有這種人的。比如有些黨員，他們對於切近的組織問題事務問題等，常常採取一種非常不嚴肅的態度去注意與研究，而輕視它們，認爲在這些問題中是不包含馬列主義原理的，他們也不會從這些問題的研究中去學習到一點什麼東西，因此，他們並不以研究資本論的嚴肅態度來研究與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不知道（或忘記了）馬列主義學說要成爲解決這些問題（行動）的指南。實際的有生命的馬列主義，恰恰就包含在這些問題中，包含在一切人的社會的具體實踐中，而不在書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

在中國黨內上述兩種意見的對抗，當時是前一種獲得勝利的，在黨內相當造成了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風氣；結果，阻止了黨內理論水平的提高。這是必須糾正與反對的，這與我黨直至今天在理論上的準備與修養依然一般不夠的現象，是有密切關係的。它給了黨內以極壞的影響。在當時黨內關於理論與實踐同時並重的正確的意見，是沒有得到發展的。

中國黨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並不比蘇聯的布爾塞維克壞；所以中國黨歷來的組織工作就是很好的，不論作什麼事，如組織工人、組織農民、組織政府、組織軍隊，進行各種方式的戰鬥，只要在黨內一動員，爲黨員所了解，歷來就能作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務，就能組織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工人農民和軍隊到革命的戰場上去。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抄人剝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些表現，是除聯共黨外，爲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黨所不及的。然而，中國黨有一種

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表現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因此，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份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直到现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雖然黨內少數同志特別中央的同志是有對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理解）；因此，現在提倡黨內理論的學習，就成爲十分必要。中國黨只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的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

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與上述錯誤的意見有關係，而成爲原因之一。但這也不是唯一的原

因，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些原因就是：

(一) 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傳入中國的歷史並不久（在五卅運動時才有很少的輸入），不像歐洲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佈已有近百年的歷史。

(二)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又由於中國當時是客觀革命形勢很成熟的國家，要求中國革命者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來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鬥爭經驗的總結（這種情形直到今天還是有的，如我們今天到處都感覺到實際工作中的幹部缺乏，一切幹部幾乎都很難從工作中抽出一種比較長期的理論學習等），所以中國黨一開始成立，就插入偉大的實際革命鬥爭中，各方面都應付不暇。這與中國黨的理论準備不夠亦是有關的，這亦是原因之一（這在中國黨秘密活動的十年中，情形就有不同。這時是有時間給黨來從事理論研究的，但中國黨也沒有抓着這樣的時候來克服理論的弱點，這當然亦是一個錯誤。這也是由於對理論重要性認識不足及對當時革命形勢過分估計而來的，雖然在這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是有偉大成績的，黨亦會給以某種重視。然而黨沒有自覺的來提高全黨的理论水平，並把這當作當時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及從事文化運動的幹部，都包含着很多弱點，滋

有豐富時的異文化運動及其經驗與全黨的全體實踐密切聯繫起來，因此，就使當時的作品十分艱澀，不深刻與不實際；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黨的理论水平。

(三) 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諸領袖，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的著作都是歐洲文字發表的。在他們的著作上說到中國事情並不多。而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具體道路，又和歐洲各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道路，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實際，並指導這種實際，就覺得特別困難些。直到現在，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還未譯成中國文字，而中國黨員能讀馬列原著的也並不多。即使能讀的人也很少去讀完。因此，也影響到中國黨員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修養。這也是中國黨理論準備不夠的原因之一。

由於這些原因，特別是我們黨的半個努力不健全二十一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鬥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這是我們今天還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的。

所謂中國黨的理論準備，是包括對馬列主義的認識與掌握。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規律的統一的把握的。這在中國黨的大多數同志們不論對那一方面都還有極大的不夠。太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這還是中國黨一個極大的工作。

這就是我的答覆。致以

布禮！

劉少奇 七月十三日

附：宋亮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

少奇同志：

我們正在研究列寧主義中「方法與理論」的一章，我在讀了列寧的「做什麼」以後，覺得在中國黨的歷史上，雖不會有過「工人事務報」派那種公開贊揚自發性，反對自覺的領導的尾巴主義觀點（對理論問題）；但在陳獨秀時代，在黨內教育政策上，似乎輕視理論教育的傾向是有的，當時任卓宣（葉青）領導下的旅莫支部的態度就是如此的。他們反對學生學習，有人稍稍埋頭讀書，即賜以「學院派」的美名，不過他們似乎並不會公開反對過理論對實踐的意義，但說過：「理論學習是黨的領導者的任務」（這說話亦不會公開向一般黨員說過）。因此，不管如何，當時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仍是妨礙了黨員理論修養之提高，間接是削弱了黨對羣衆自發運動的覺悟的領導。雖然他們似乎沒有把這種錯誤主張公開發揚成爲一種「理論體系」。不知我這意見對否？我不知道當時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領導者本人，對此問題發表的意見如何？但只知道在卓宣等旅莫支部負責人的政策論或如此。學員們教習舉中國例，抄來問的，請給以答覆，並致布爾什維克敬禮！

宋
七月十三日

論 黨

著 者 劉 少 奇

出版兼 發行 者 太 岳 新 華 書 店

定 價 每 冊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四 月 出 版

I—2000

121
13

6504

49 7 塔

0.202